THE OBSERVER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一、十六出版 ·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 每份價一千元

第六卷 第四期

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專欄

斯大林教導了我們（社論）

我向你高呼萬歲 郭沫若

斯大林的生平 觀察編輯部

專論

人民幣的戰鬥任務 笪移今

論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 樓邦彥

政治熱忱與科學熱忱 盧于道

報告

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 儲安平

介紹與翻譯

一九四八年度蘇聯經濟建設成績的報告 蘇聯國務院中央統計局

觀察通信

走向人民大學的里程碑——記清華大學的代表會議 觀察特約記者

冀西農村旅行所見 觀察特約記者

讀者觀察

關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吳方高・樊弘

我的認識過程 胡遇復

公營與私營 張敬亭

人民的火車 李梅

自發的愛護 張文琦

觀察漫畫

大事記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報告

請教讀者

我們有一件事情不能決定，現在向讀者公開提出，請大家提些意見。

關于本刊第二頁的篇幅，怎樣利用，我們總想不出好的辦法。在過去三期中，我們因爲有許多事情要向讀者報告，所以就把這些報告排在第二頁，無形中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復刊之初，需要向讀者報告的事情比較多，但這一階段過去以後，需要向讀者報告的事情便漸漸少了。有事情要報告，利用這一頁篇幅，固然很好，假如僅僅爲了這一頁篇幅無法利用，硬要湊成一頁「報告」，好像業務報告也成爲了固定的一欄似的，這就不合理了。但是在整個的編排上，這第二頁一頁究竟應當固定地排些什麼呢？我們總想不出一個十分理想的辦法。

現在有幾種材料是可以排在第二頁的：

1.「讀者觀察」。從前的「讀者投書」就是排在第二頁的，現在的「讀者觀察」自然也可以排在第二頁。但是我們覺得其間也存在着一些困難。第一、現在的「讀者觀察」和從前的「讀者投書」，性質不完全相同，所以它們在編排上應佔有的地位也不一定相同。第二、從前的「讀者投書」大都是些短信，有短到一二百字的，所以雖然祇有一頁，有時可以登載五、六封投書，現在「讀者觀察」來信字數較長，我們預算要佔兩頁甚至三頁地位，所以不合適排在第二頁。第三、過去的「讀者投書」，從二卷一期起，前後兩年，是經常有的，以後的「讀者觀察」，雖然希望每期都有，但也要看篇幅的條件而定，不一定每期都有。基于上述三點，所以我們覺得把「讀者觀察」移在第二頁上，也不盡妥。

2.「觀察漫畫」。漫畫規定每期一頁，又與其他文字並無牽連，所以也可排在第二頁上。但我們討論後，覺得把漫畫排在社論前面，一翻開封面就是漫畫，也覺得不十分理想。

3.「大事記」。「大事記」也是單獨的固定每期有的一欄，這也是可以考慮排在第二頁的。但第二頁的地位，在編制的格局上，雖然不算是正式的一頁，但它所佔的位置，在封面之後，社論之前，很是注目，把這一頁篇幅排「大事記」，覺得可惜。

有這麼些問題存在，所以我們總不能得到一個最好的辦法，現在很誠懇的徵求讀者的意見，請大家幫助我們想想。我們希望讀者在本月月底以前寫信給我們，以便我們可以早日總結讀者的意見。

大事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十一月十六日

京綏路恢復通車，察北防疫封鎖線部份撤消。

亞澳工會會議在京開幕。

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閉幕。

南駐蘇使館代辦進行反蘇活動，蘇照會南國驅逐出境。

聯大政委會討論蘇聯關於譴責新戰爭準備與五強締結加强和平公約提案，維辛斯基痛斥英美集團。

十一月十七日

華東學代會議開幕。

世界工聯總書記賽揚在亞澳工會會議第二次大會上，報告世界工聯在亞澳各國的活動和它的任務。

法國總工會發表宣言，號召全國總罷工，要求提高勞動人民生活。

十一月十八日

政務院舉行第六次會議，陳雲副總理報告物價問題，周總理指示處理原則。

京漢路京石段正式通車。

福州、浔廈兩大戰役殲敵十萬，解放全福建。

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閉幕。

十一月十九日

毛主席電覆印度共產黨與社會共和黨對我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賀。

十一月二十日

華東學代會議閉幕。

首都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

亞澳工會會議全體會上伊朗、越南、印度、緬甸代表揭露英美帝國主義罪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京市人民政府封閉全市妓院。

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忠告西南僞軍政人員，迅速脫離反革命陣營。

亞澳工會會議上，我代表李立三報告我國工運。

北京與莫斯科無線電通話。

瀋人民法院判處毒毆工人美僑瓦爾德徒刑。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閉幕，選出正副市長及市府委員。

桂林解放。

阿哈買提江等遇難，毛主席電新盟中央委員會弔唁。

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處理勞資關係問題三文件的通知。

民革舉行中央全會，選出主席及常務委員。

聯合國將周外長否認蔣廷黻代表團聲明，作爲正式文件發表。

國際婦聯理事會閉幕。

十一月二十三日

周外長照會阿爾巴尼亞，歡迎與阿建立外交關係。

亞洲婦代會國際籌委會成立，國際婦聯代表離蘇來京。

蘇聯支持周外長聲明，維辛斯基在聯大否認國民黨代表爲中國代表。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全國稅務會議開幕。

全印和平大會在加城開幕。

美英阻撓通過蘇聯和平計劃，聯大政委會否決蘇聯提案。

十一月二十五日

保共中央舉行全體會議，討論情報局決議。

政務院舉行第七次政務會議，通過京市正副市長。

柳州、梧州解放。

全總通知各地產業工會，歡迎勞協會員參加工作。

亞澳工會會議發表公報，通過數項促進民主工會運動決議。

聯大政委會討論國民黨冒牌代表誹謗性聲明，蘇波捷等國代表拒絕參加。

法國工人總罷工。

十一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電覆毛主席，感謝對十月革命節的友誼祝賀。

東北十一個市縣長會議上，主席高崗總結各地人民代表會經驗。

首都婦女代表大會開幕。

瀋市人民法院判處美間諜佐佐木弘經等徒刑。

十一月二十七日

廣西蒙山解放。

蒙古共和國二十五週年，斯大林特電祝賀。

全印和平大會勝利閉幕。

芬京舉行和平與芬蘇友好大會。

十一月二十八日

政務院第八次會議，討論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草案。

鐵道部調整客運價格，按現行運價增加百分之二百五十。

英共廿一屆代表大會閉幕，杜德提出大選綱領。

十一月二十九日

國民黨殘匪勾結法帝，企圖逃往越南，周外長發表聲明：容留匪軍各國須担承一切後果。

首都婦代會勝利閉幕。

世界青聯抗議尼赫魯政府迫害愛國人士。

共產黨情報局發表三項重要決議，動員最廣大群衆保衞和平。

阿爾巴尼亞歡慶解放五週年，電斯大林致敬。

十一月三十日

華中豫鄂贛湘等省，順利完成秋徵。

重慶解放，匪首蔣介石逃往成都。

全國首屆煤礦會議閉幕。

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機構人事部分調整。

保叛國案提起公訴，控告前部長會議副主席科斯托夫等出賣祖國。

發行者：觀察社
編輯部：北京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電話：④一一九六號 電報掛號：六〇三四
發行所：①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滬九〇〇二七 ②北京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觀察
第六卷第四期
1949.12.16.

本期作者
郭沫若：國務院副總理（第一次給本刊寫稿）
曾移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濟研究專員
樓邦彥：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盧于道：復旦大學理學院院長（第一次給本刊寫稿）
儲安平：本刊主編

社論

斯大林教導了我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元帥滿七十歲了。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將興奮而活躍，以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感情來慶祝他的壽辰。我們中國人民正臨人民解放戰爭的高潮，在人民民主革命即將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尤其要向這位偉大革命導師表示深重的敬意、無限的謝忱和無窮的愛慕。

太陽照在大地上。天空、海洋、山嶽、湖沼都浸潤在我們祖國的懷抱裏。大多數農民已經得到了土地。工人階級已經升到了領導地位。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都團結在我們的領袖毛澤東的周圍。我們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下，慶賀我們的導師、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的七十壽辰。

我們首先要向他表示深重的敬意，因為在我們開始革命的時候，他首先為我們指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道路。

遠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就闡明了關於列寧指導各國革命運動的策略原則：「在為個別國家的工人運動草擬共產國際領導指示時，必須顧到這些每一個別國家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獨立性。」從這個原則出發，斯大林指出了：「中國革命不是俄羅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翻版」；「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除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般特質之外，中國革命還將有自己的特殊性，這些特性一定會在中國革命史上蓋上自己特別的印記」。這是偉大的斯大林的天才預見，這是人民中國的轉捩點，也恰恰成為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前奏。

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求中國革命用近似十月革命所進行的速度來舉行；但是馬列主義者斯大林指出了：在不利的條件下以過分向前的速度發展中國革命無異是給予中國革命的敵人以莫大的便宜。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去團結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是馬列主義者斯大林指出了：由於在中國無產階級面前站着強大的敵人——大小封建地主、新舊軍閥和官僚、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東方和西方的帝國主義者——為了擊破這些強大的敵人，中國的無產階級必須把國內的一切革命力量都拉到統一戰線上去。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自己的口袋裏總是有現成的模型、一切國家都可適用的圖樣、任何條件下都是必須的公式；但是馬列主義者斯大林卻永恒不渝地繼承着列寧的道路，孜孜不倦地調查、研究、探索、把握每個民族的特殊性和獨立性。

一九二七年四月，斯大林就依照列寧的策略原則和中國的特殊條件和特殊情況，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基本性質是反帝的、反封建的、反官僚的。由此，他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兩條發展道路：

「或是民族資產階級擊破無產階級而和帝國主義者勾結，並且和它一同來進攻革命，以便用建立資本主義的統治來結束革命；或是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在旁邊，強固自己的指導權，把城鄉千百萬的勞動者領導在自己的後面，以便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然後帶着從這裏所發出來的一切後果，漸漸地把革命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去。」

他指出了這兩條道路之後，他又鼓勵我們，警惕我們。

他鼓勵我們說：「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中國無產階級可以很順利地來利用這專政的經驗，使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實現的可能性大大地容易了。」

他警惕我們說：「從另一方面說，那一個事實，就是，在基本上，帝國主義者是用統一的戰線來進攻中國革命的，現在的帝國主義者中間，比方說，沒有像十月革命之前那樣在帝國主義陣營中所存在過的那種分裂和那種戰爭，這些都會削弱過帝國主義，——這一事實是說明，中國革命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比起俄國革命來，要遇到更多更多的困難，在這革命的進程中臨陣脫逃和中途叛變，比起蘇聯的內戰時間，要無比的增加。」

正因爲如此，斯大林指出了：「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是在於爲爭取中國革命的第二條道路的勝利而鬥爭。」

二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就是爲了要爭取如上所述的第二條道路的勝利。如今，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斯大林所指出的道路上，穩步地向着社會主義的目標前進。這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共在領導上的勝利，這是斯大林道路在中國境內的勝利，這是馬列主義在十月革命以後的又一次的輝煌勝利。

其次，我們要向斯大林大元帥表示無限的謝忱，因爲他給了我們在蘇聯勝利了的革命經驗，這些經驗減輕了我們在革命進程中所遇到的和在今後各條建設戰線上可能還要遇到的各種艱苦的鬥爭。

第一，他教導了我們怎樣了解革命理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特殊作用。

「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能有革命的運動。」這是列寧的名言。斯大林也不止說過一次，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是布爾塞維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是解放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人的思想武器。他又指出這武器在我們的時期（即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就是列寧主義。帶有括弧的馬克思主義，是孟塞維克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新型的政治陰謀每每是從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來開始的，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

斯大林以身作則教導共產主義者：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應用於十月革命以後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活的現實上來建立自己的戰術和戰略，以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時，他對一切損害、歪曲、背叛馬列主義的卑劣企圖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斯大林的全部事業使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運動一齊向前推進。

斯大林之所以成爲全世界勞動人民解放運動的領袖，能夠獲得廣大羣衆的擁護、尊重和敬愛，就是由於他這樣的效忠於馬列主義，把它變成了物質的力量；就是由於他這樣的精通馬列主義，把它的理論和階級鬥爭的具體問題聯系在一起；就是由於他能拿革命運動的新經驗來推進並創造馬列主義的理論，使它永遠成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爭取勝利的武器。

第二，他教導了我們怎樣建設、鍛鍊、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

斯大林首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無產專政的勝利，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十月革命前後都伴隨着列寧以建設、鍛鍊、鞏固布爾塞維克黨爲主要的任務。列寧——斯大林的黨是新型的黨。它不是議會選舉機構或職工會的附屬品。它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是無產階級作戰的司令部，它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的使命是組織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那就是說：把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結成同盟；把無產階級日常的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配合起來；把不容妥協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融通性結合起來；把革命的原則性和群衆的智慧聯系起來，一方面向群衆學習，一方面訓練並教育羣衆，把他們提高到黨的水準上來。

列寧曾經說過，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這種組織外，就沒有別的武器了，所以，斯大林在列寧去世後的孜孜不倦的活動大部分就是爲着要實行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他指出：黨必須有鐵的紀律，這種紀律就是革命思想的一致性，革命目標的顯明性和革命言行的統一性；黨必須運用自我批評的武器，這武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反而要把錯誤暴露出來，並藉自己所犯的錯誤來改善和教育自己；黨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使黨的羣衆製定自己的決議並督實自己的組織，把這決議付諸實現；黨必須有系統地檢查自己所有的決議和訓令的執行情形，以免決議和訓令變成空頭支票。

第三，他教導了我們怎樣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環境的包圍之下，也有建成共產主義的可能。

從舊時代所遺傳給我們的環境方面來說，中蘇兩國頗有相同的地方：中蘇兩國都「是一個技術落後的國家，幾乎是赤貧的、破產的國家」。俄國受了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破壞，中國受了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破壞，接着兩國又都受了三年內戰的蹂躪，「其中居民很少識字，技術落後，工業好像個別孤島一樣沉沒在無數極小農莊這一汪洋大海中」。中蘇兩國革命的任務都是要把這個國家「由中世紀的黑暗無知的軌道上，轉移到現代工業和機器化農業的軌道上去」。這個任務的嚴重和困難在兩國也是相同的。當年的蘇俄（一九二一——五年）和目前的中國都是「處在技術十分缺乏的時期，沒有充分機器來供給工業，沒有機器來供給農業，沒有機器來供給運輸業，沒有國家工業改造事業所絕對必需的那種最低限度的技術基礎，而只有一些創立這種基礎的前提。」斯大林對蘇聯人民這樣說：「問題是這樣擺着：或者是我們在最短期間就把這個任務解決成功，於是在我國把社會主義鞏固起來；或者是我們解決不了這個任務，那時我們這個技術薄弱、文化落後的國家就會喪失獨立地位，而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玩具。」毛主席在今年夏天也指出來：「只有中國的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倚賴外國了，才有眞正的獨立。」

我們相信，這個任務是可以解決的，因爲蘇聯已經解決了它。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改變了俄國落後的面貌。幾屆的斯大林計劃已經使蘇聯由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爲現今頭等強大的工業國家了。毫無疑義，這是偉大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有以致之，這是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有以致之。在實行第一個

五年計劃的時期內，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在實行各方面極端節省，積累了創立國家工業所必要的資金；在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斯大林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使蘇聯人民在一切工作部門裏創立了廣大的技術基礎，消滅了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到了十分缺乏人材的時期，斯大林就提出了「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要求各部門的領導人員「注重人材，注重幹部」，注重精通技術、駕馭技術並推動技術前進的工作者，「對他們表現出最關切的態度」，「培植他們，獎勵他們，提拔他們」；到了社會主義競賽高漲的時期，斯大林掀起了斯達漢諾夫運動，他告訴我們，這個運動，打破了對於技術的舊觀點，打破了舊的技術定額、舊的生產標準和舊的生產計劃。這就是列寧斯大林的黨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路線。

「有人以爲只要把黨的正確路線規定出來，把它當衆宣布出來」，勝利就會自行到來。斯大林指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他說：「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才能這樣設想」。斯大林的經驗告訴我們，蘇聯的勝利是在「力求實行黨路線的殘酷鬥爭中爭得的」：反對管理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撤銷「那些從前有過某種功勞，而現在儼然以顯貴自居的人」，降低那些愛說廢話而沒有本事克服困難的人的職位，隨時審查機關工作狀況並揭露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的原形，動員全體黨員和工人階級去克服一切阻礙，一切困難。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這樣爭取的，斯大林是這樣教導了我們的，建設新中國的任務也必須這樣跟着斯大林的腳步去進行的。

最後，我們要向斯大林大元帥，這位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表示無窮的愛慕，因爲他所爭取到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但影響到中國革命，並且影響到各國勞動人民的解放。

斯大林，像無產階級的化身一樣，他的言論、他的政策、他的偉大的輝煌成果都是國際性的。 無產階級除非同時解放各國被壓迫的人民，就不能解放自己。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特點，也是斯大林全部革命道路的原理。

斯大林對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不朽的貢獻，首先表現在蘇聯境內。他在蘇維埃政權的基礎上，按照列寧公開宣布的政策，根本解決了歷史上從未解決過的民族問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主要點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國際主義，不是以各民族的相互仇視、相互衝突爲出發點，而是以各民族的相互信任、親密、接近爲標的。他嚴格的遵循了列寧的國際主義的原則，把蘇聯境內的各民族形成了一個兄弟般的結合，蘇聯各民族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使蘇聯各民族共和國的經濟能夠基於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集體化而抵於成功，使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得以發展繁榮，使蘇聯各民族的人民能夠在道義上政治上取得一致，更加堅固的團結，拿各民族的人民在勞動和衛國戰爭的無數功勳來證明蘇聯的愛國主義的熱情。

這就是斯大林所計劃的、鞏固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自從一九三六年起，他又用立法的手續更進一步地把它鞏固起來而產生了有名的斯大林憲法。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素被賤視的民族，素被奴役的民族，也就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昇到了眞正自由和眞正平等民族的地位，並以身作則鼓舞着一切被壓迫民族。」

由於在蘇聯境內建立了這樣輝煌的國際主義，斯大林更被全世界的勞苦大衆作爲領袖，而蘇聯也就成爲了全世界的革命運動的公開中心，莫斯科也就成爲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們的避難所和學校。蘇聯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實在是全世界的勞動人民的靠山、屏障和希望。

同樣的，各地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各國無產階級的覺醒，無產階級在各國革命運動與所起的領導作用，以及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的解放等，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相聯的關係。蘇聯人民的勝利加強了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人民的鬥爭，而資本主義各國勞動人民的鬥爭也加速了蘇聯走向共產主義的行程。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是分不開的。他們都團結在斯大林的周圍，從他那裏得到了爲全世界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利益而服務的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和統一感情。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第二次反法西斯大戰中全部的表現了出來。蘇聯人民與德國的法西斯强盜作過英勇無比的鬥爭，他們捍衛了社會主義的祖國，勝利的蘇聯解放了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勝利的蘇軍又解放了我們的東北。假如由於帝國主義的戰爭販子的挑撥而居然發生了侵略戰爭，我們相信：保衛社會主義國家，保衛人民民主國家，保衛世界和平，必然要成爲全世界的勞動人民的共同事業。我們必將像蘇聯當年在抵抗德國法西斯强盜的侵略戰爭中所表現的英勇鬥爭一樣，掀起斯大林式的愛國主義的熱潮來保衛我們的祖國，來掩護我們勞動人民的前途。我們的愛國熱潮是國際的，我們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在斯大林大元帥的教導下，我們一定要向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標前進，決不後退一步！

回顧艱苦締造的歲月，遠瞻和平發展的前程，我們不禁興奮而活躍，懷着無比的歡欣的心情，向斯大林大元帥表示最大的敬意、無限的謝忱、無窮的愛慕。我們必須繼續向他學習，學習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學習國際主義的精神，學習對敵人毫無慈悲而對人民無比熱愛的敢作敢爲的無產階級的現實主義。這些都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也就是我們慶祝斯大林大元帥七十壽辰的最重要的意義。

我向你高呼萬歲

郭沫若

斯大林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

一個人要活到七十歲，甚至一百歲，
本來並不算得是什麼稀罕的事。
一個人假使無益於人而且有害，
那就讓他活到十七歲也未免太多。
但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你的生命
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生命，全人類的生命。
你的七十歲已經救活了不知道好幾萬萬的人民！
你的七十歲已經是地質學上的年齡了，
已經是天文學上的年齡了，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爲秋，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爲春。

而且空間不能限制你的偉大，
而且時間不能限制你的長壽，
你已經活了七千億萬恆河沙數地質年，
你還要活下七千億萬恆河沙數天文年，
你是無窮盡，你永遠無窮盡！

稀奇的是你已經死了多少次了！
勞動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
戰爭販子，大資本家，大地主，
一切剝削人的吸血者和他們的爪牙，
都詛咒你死，願望你死，並欣幸你死，
你確確實實是死過多少次了！
但你依然活着，而且要永遠活着！
舊時代的救世主耶穌，
死了一次，據說是復活了一次；
新時代的解放者，你，
死了多少次，也復活了多少次。
耶穌的死是真的，復活是假的；
而你的死是假的，復活卻永遠是真的。

我曾經看見過你，你偉大的解放者，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六月三十日，
在你的領導之下把納粹德國消滅了，
拯救了全世界的勞動人民，
恰好迎接了蘇聯科學院的二百二十週年紀念，
那天晚上你在克里姆林宮
款燕全蘇聯的學術界的權威，
戰鬥英雄，勞動英雄，和全世界的進步學者，
你從七點鐘入席一直陪到十二點過，
你和全堂的人同歡共樂足足五個小時。
那是多麼驚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我曾經看見過你，你偉大的解放者，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二日，
蘇聯的人民既消滅了西方的納粹德國，
又擊潰了東方的皇道日本，
集合着十六個共和國的光榮的兄弟
在紅場上進行着體育節的勝利大檢閱。
那是光輝燦爛的歡樂的一天，
你在萬雷鳴動的歡呼聲中
出現在偉大列寧的墓上，
從上午十一時站立到下午四時，
你和全場的人同歡共樂足足站了五個小時。
那是多麼驚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我曾經看見過你，你偉大的解放者，
那是今年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一日，
莫斯科舉行勞動節的慶祝，
在紅場上有二百萬人的大遊行。
我們從捷克的首都布拉克參加了
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歸途躬逢其盛，
時間雖然相隔了四年，而日子，
依然是那麼光輝燦爛的歡樂的日子，
你又在萬雷鳴動的呼聲中
站立在偉大列寧的墓上，
從上午十時站立到下午三時，
你和全場的人同歡共樂也足足站了五個小時。
那是多麼驚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時間儘管流蕩，物質儘管流蕩，
你的健康和毅力是不變，是永遠不變！
你和辯證唯物主義一樣永遠不變，
你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樣永遠不變，
你和人類歷史走向共產主義一樣永遠不變！
不，這樣的稱頌或許有背于辯證邏輯吧？
你應該也是在變的，但是全人類解放者，
你是愈變愈堅強，愈變愈健康，愈變愈不朽了！

不朽的馬克思和你同在，
你和馬克思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
你和恩格斯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列寧和你同在，
你和列寧一樣永遠不朽了！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熱將使南北兩冰洋化爲暖流，
你的潤澤將使撒哈拉沙漠化爲沃土，
你的智慧將使江河改流，山嶽奔走，
大地永遠年青，人類永遠如兄如弟！

斯大林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斯大林的生平

觀察編輯部

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俄國梯弗里斯州的哥里城生出了一個偉大的人物：約瑟夫·斯大林（米加施維里）。他的父親維薩里昂·依萬諾維奇是個農民出身的格魯吉亞民族的皮鞋匠。他的母親是個農奴的女兒。斯大林九歲入哥里城的教會小學讀書，一八九四年（十五歲）卒業後，即於同年升入梯弗里斯城的正教中學。當時高加索已是工業發達的地區，資本主義勢力已見抬頭，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也就在這沙俄的殖民地被生了萌芽。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流放到南高加索來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就在這裏努力進行革命工作。影響所及，梯弗里斯正教中學也就成爲了培植各種解放運動思想的苗圃，助長了斯大林的革命思想和情緒，使他於十五歲的時候就成爲了一個革命家，參加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秘密小組，而於一八九八年八月正式加入該城的社會民主工黨組織，當了「麥撒墨達西」社員。這個團體是擁護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思想。然而少年時代的斯大林卻領導這團體的少數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使格魯吉亞革命社會主義派的種子在這裏萌芽。斯大林特別努力學習。他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於列寧的解釋特表欽佩。他的理論興趣極廣，舉凡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自然科學、以及典型的文藝作品等無不涉獵。他常常在工人組織裏努力宣傳，參加秘密工人會議，寫傳單，組織罷工。那時候，梯弗里斯城內各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學習的大綱都是由斯大林編製的。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斯大林因爲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而被開除學籍，他只好依靠授課來維持生活，後來就進了梯弗里斯城的觀象台，担任測量的工作。然而他卻片刻也沒有間斷過他的革命活動。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間，梯弗里斯城組織裏形成了社會民主黨的中心領導集團，成立了一個秘密的社會民主黨組織，斯大林就是這集團的領袖，他使工人運動脫出了僅在優秀工人份子中進行宣傳的範圍，而依據列寧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原則和群衆結合在一起，舉行反沙皇制度的群衆大會和政治示威。這種作法雖然受到了「麥撒墨達西」社的機會主義者的攻擊，卻得到了梯弗里斯城的先進工人的擁護。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列寧創辦了火星報，斯大林完全擁護該報的主張，他信任列寧的革命天才，願意追隨列寧的道路前進。這一年正好是沙俄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梯弗里斯城的工潮日益增長，斯大林便於次年四月二十二日組織領導梯弗里斯城中心所舉行的五一示威。這工作是秘密進行的，因爲沙皇的警察第一次於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到斯大林的住宅和觀象台來搜查。後來又發覺暗探局的逮捕令。從那時起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爲止，斯大林都是在秘密的條件下過着他的革命生涯。斯大林除了組織工人，策劃示威以外，又努力於文字的工作。他於一九〇一年九月創辦了鬥爭報，用格魯吉亞文字著述論文，又用南高加索境內各語言印行傳單。該年十一月十一日，梯弗里斯城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召開代表大會，斯大林當選爲梯弗里斯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的委員。不久，他就被派到巴士姆去建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他領導著名的巴士姆示威，而於四月五日被捕。次年秋天，斯大林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東部的新烏達村，期限三年；該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收到第一封列寧給他的信。在流放所逗留未久，他就於次年一月五日逃走，二月重至高加索工作，實行列寧所規定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計劃，成爲了該地的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腦人物，激烈反對孟什維克主義，領導了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的巴庫大罷工，使工人和煤油廠主訂立了俄國工人運動史上的第一個集體合同。這時期，他的主要工作在於反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他的武器就是刊物。當時高加索的一切布爾什維克出版物幾乎都是他所發起組織的，其中以「無產階級鬥爭報」和「無產階級鬥爭小報」最爲重要。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的事變前夜，斯大林對於傾向和沙皇是妥協的自由黨人大加攻擊，他又堅決捍衞列寧，認爲武裝起義是必要的。這思想整個的表現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之間的斯大林著作裏。一九〇五年十月的總罷工表明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逼得沙皇發表了十月十七日的宣言，許給人民各種自由。這宣言其實是欺騙民衆的手段，發表的當天，斯大林就在工人群衆大會上說：「爲着眞正獲得勝利……就需要三件東西：第一是武裝，第二是武裝，第三也還是武裝。」不幸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武裝起義失敗了。自是黨內的鬥爭激烈起來了，無政府工團主義也出台活動了。然而斯大林還是英勇的在高加索反對一切反無產階級的派別。一九〇六年四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斯托哥爾摩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參加會議，和列寧一同捍衞布爾什維克，反對孟什維克。會後，他又回到高加索工作，領導公開出版的「新生活」、「新時代」、「我們的生活和時代」。這時期，革命潮流漸見低落，克魯泡特金派的無政府主義就乘機在南高加索一帶加緊活動。斯大林特別爲此寫了「無政府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來保衞布爾什維克的理論。他特別用力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揮。一九〇七年四五月之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倫敦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參加會議，於會中鞏固了布爾什維克對於孟什維克的勝利。

自從俄國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到第二次革命之間，一共經過了十個年頭。這是保衞和鞏固秘密的革命黨實行布爾什維克堅決鬥爭的年代，努力組織和教育工人群衆的年代，和沙皇的警察作特別堅忍鬥爭的年代。沙皇看出了斯大林對於革命活動的影響，就繼續不斷的用逮捕、監禁、和流放的手段來對付他。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三之間，斯大林先後被捕七次，流放六次，而於流放所逃走過五次，只有最後一次的流放，才是由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把他解救出來的。然而沙皇的酷刑並不能夠沖淡斯大林的革命熱情，每一次逃出流放所之後，他就更加堅強地實行革命的鬥爭。一九〇七年七月起，他在巴庫反孟什維克和指導巴庫工人的鬥爭事跡，他和奧列托夫等人的團結，他於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被捕、被監禁、被流放，而於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逃脫之後重新回到巴庫的秘密工作，他於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被捕、被監禁，而在索里維切果夫茨克流放所致書列寧的擁護黨反托洛茨基的姿態，一九一一年下半年他從沃洛果達秘密逃往彼得堡之後的反取消派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份子的鬥爭，一九一一年九月九日在彼得堡被捕，而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從沃洛果達流放所逃走之後的工作，這一切都表明了他是如何的一次比一次的堅定，一次比一次的努力。一九一一年一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普拉加會議終於把孟什維克驅出黨外，建立了布爾什維克黨，他的功勳實在是不可磨滅的。普拉加會議預測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就決定採取武裝全黨來作迎接這高

潮的一切辦法。會議選出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創辦眞理報的議案，成立了俄國中央局，以斯大林爲中央委員兼主中央局；其時斯大林尚在流放所，列寧就派人到沃洛果達去見他，告訴他會議的經過。於是，斯大林又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廿九日脫逃，奉令巡視各重要區域，籌劃當前的「五一運動」，並發起創辦了眞理報，於四月二十二日（新曆五月五日）出刊第一期。眞理報問世的當天，斯大林在彼得堡街上被捕，經過幾個月的監禁，被流放到更遠的納賴姆邊區，期限三年。是年九月一日，斯大林又從流放所逃回彼得堡，主編眞理報，領導布爾什維克在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運動的工作；雖然日夜受到警察的追踪，他仍然是挺而走險，常在群衆大會上演講。在這時期內，斯大林和列寧的關係也更加密切的建立起來了。列寧給斯大林寫信，嘉許他的工作和言論，斯大林也到克拉科夫去訪問列寧兩次。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又於彼得堡被捕，流放到遙遠的土魯汗斯克，限期四年，初居科斯廷諾村，後以警憲恐其逃脫，被解至北極圈附近的庫萊卡村，過着最苦痛的政治流放生活。

正當斯大林在西伯利亞過着艱苦的流放歲月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第二國際各國黨無恥地叛變了無產階級，投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去。只有列寧，只有布爾什維克始終忠實於國際主義和無產階級。其時斯大林與外界完全隔絕，但常與列寧通信，擁護列寧在戰爭、和平與革命各問題上的立場。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斯大林因受徵入伍而先後被押到克拉斯諾維斯克和阿達斯克。他在這裏聽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而於翌年三月離開阿達斯克城，回到革命首都彼得堡，承中央的委託，領導眞理報的工作。當時，布爾什維克黨才脫離秘密狀態，列寧尚在國外。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百般爲難，阻止列寧回國。斯大林就和莫洛托夫共同領導布爾什維克鬥爭，不信任帝國主義臨時政府的政策，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護國主張，反對加米涅夫等機會主義者所謂的有條件的贊助臨時政府的立場。列寧終於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回到俄國。回國之後第一天，他就發表了他的「四月提綱」指示推翻沙皇之後黨的奮鬥方針。斯大林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堅決擁護列寧的路線。又與列寧共同組織六月十八日的示威。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以後，列寧受到反革命臨時政府的誣陷和追究，不得不躲藏起來。斯大林堅決反對列寧到反革命法庭去受審，救全了列寧的生命。斯大林遵照列寧的指令於第六次黨代表會議裏使黨規定了武裝起義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是年八月，科爾尼洛夫舉行叛亂，企圖復辟。布爾什維克發動民衆，擊破了科爾尼洛夫。十月二十四日清晨，克倫斯基下令封閉黨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派出裝甲車包圍編輯部和印刷所。但是到了上午十點的時候，赤衛隊員和革命兵士卻已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把裝甲車擊退，十一點的時候「工人之路」也就出版了，上面還登載着斯大林的論文，號召群衆去推翻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同時，又遵照黨總部的命令把赤衛隊員和大隊革命兵士都調集到斯莫爾尼來。十月廿四日起義開始了。二十五日傍晚，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開幕，實行把全部政權轉交給蘇維埃。這就是十月革命。這革命把全世界分爲兩個體系：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布爾什維克的任務也隨着改變了。斯大林拿他的革命天才輔翼了列寧。他幫助列寧解決了全蘇聯境內的民族問題，促進建立許多自治蘇維埃共和國和自治省，他幫助列寧反對加米涅夫等工賊和革命逃兵，擊潰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的軍隊，打破官吏和公務員的怠工，消滅反革命大本營和沙皇將軍府，封禁資產階級報章，同反革命烏克蘭拉達鬥爭，解散立憲會議，起草一九一八年的第一個蘇維埃憲法。他又奉中央的委託於一八一八年一月舉行歐美各國社會黨內革命派的國際代表會議，給第三國際的鬥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又協助列寧在布列斯特和議的艱難時日堅持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打破了叛徒托洛茨基的企圖。在地主和外國資本家相勾結來實行內戰和武裝干涉的戰爭裏，斯大林的功勳更是無比的。他一方面籌劃民食，一方面佈置軍防，任何軍事上遇有危急的時候，黨就派他去工作，他也終於能夠把戰局轉危爲安，擊退了英法的武裝干涉，協約國的第二次侵犯和波蘭貴族的第三次進軍。干涉戰爭和國內戰爭結束了之後，他就開始協助列寧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取消了餘糧收集制，施行糧食稅，實施列寧所提倡的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黨中央全會就根據列寧的提議選舉斯大林爲中央總書記。列寧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之後，一切的建國責任都由斯大林來担負。那時候，托洛茨基和他的幫手們乘列寧的逝世機會強迫黨來進行新的爭論。斯大林就團結了黨的幹部，組織了粉碎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領導黨在正確的列寧路線上前進。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快要終結了，蘇聯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狀況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內的革命運動暫時低落了，資本主義的局勢暫時穩定了，蘇聯經濟已經到達了戰前的水準。於是，斯大林就領導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他一方面打擊機會主義、取消主義和其他右傾的主張；一方面順着發展之規律進行經濟的建設。前後消滅了托洛茨基的集團和布哈林集團，先把中農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再走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道路，使蘇聯的經濟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正軌，幾次的斯大林五年計劃都提前的完成了。然而國內的富農殘餘還在夢想破壞，他們曾經組織過暗害團體，而一部分反動份子也改頭換面地裝出過分左傾的姿態來給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爲難。斯大林除了設法摧毀這種暗害團體以外，又在思想上强調提出反對左傾的偏向，同時贊助了强大的斯達漢諾夫運動，提倡高度科學技術的學習，說明商人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稱讚婦女在革命和建設工作上的功勳。蘇聯的成功引起了各國革命家的崇拜，結隊前來訪問的國際朋友們也一天一天的多了起來。全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引起了國內階級關係中的根本改變，於是，他就建議修改憲法，而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由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了他的憲法草案。這憲法保證了蘇聯一切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擁護勞動者利益，獎勵從事科學活動，允許參加民族解放鬥爭而遭受追究的外國公民有居留蘇聯的權利，表明了全國政治生活更進一步的民主化，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選舉也公推斯大林爲第一名人民使者，第一位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代表。

這時候，正臨着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國際狀況緊張到了極點。戰後和約體系已經瓦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跟着開始了。先是，英法各國都曾計劃過進攻蘇聯，斯大林都以外交的天才避免了戰爭。蘇聯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他並沒有侵略的野心，他願意和各國修好。然而英法二國卻在慕尼黑會議中給希特勒的德國送秋波，而德國也就和東方的日本此唱彼和的引起了世界大戰。當時英法的外交家對蘇聯進行一種不誠實的政策，拖延了和蘇聯的談判，而向蘇聯提出了一種顯然不能夠接受的協定條件，使蘇聯不得不爲保障自己的安全而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然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的帝國主義德國卻蠻橫的破壞了互不侵犯條約，背信進攻蘇聯，斯大林號召全國的民衆來保衛社會主義的祖國。雖然作戰初期，因爲缺乏準備，損失了不少土地，但是斯大林的英明終於在斯大林格勒戰役裏給希特勒以致命的打擊，再因爲和英法美的聯盟而打倒了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然而勝利之後，因爲美國帝國主義的備戰狂，全世界又處在戰爭的威脅之下。斯大林正以全世界無產階級領袖的資格領導全世界爲和平而鬥爭，爲人類謀幸福。（本文是依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亞歷山大洛夫等六人所編的「斯大林傳略」而寫成的。）

人民幣的戰鬥任務

笪移今

最近在商品市場上掀起的物價暴風，嚴重地損害人民幣的信用。因此，有些人便對人民幣的購買力，又由懷疑而動搖而不信任了。直覺地低估人民幣，對物價悲觀，固然欠當；盲目地高估人民幣，對物價樂觀，亦屬不妥。祇有認識了人民幣的本質與任務，才會正確地理解當前的物價問題，才能從烟霧的現象中看出眞實的前景。

一 人民幣的誕生

早在對日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各遊擊區，在被內外敵人封鎖包圍的情形下，爲要便於堅持獨立作戰，爲要圓活進行各孤立根據地的經濟活動，不得不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因時制宜的辦法，先後在各邊區設立銀行，發行各色貨幣，最多曾達二十多種。抗戰結束以後，各解放區政府，即着手進行貨幣統一工作。但因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人民反民主的全面內戰，貨幣統一工作遂半途而廢。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隨着人民解放軍反攻勝利，解放區日益擴大，分散的地域，逐漸連成一片。貨物交流頻繁，貨幣單位不同，阻碍了貿易發展，甚至有時且還增加了軍事作戰的困難；迫切地感到有迅速統一各解放區貨幣的必要。爲了適應情勢，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首先在西北解放區停止了陝甘寧邊區銀行貨幣的發行，統一於西北農民銀行貨幣。此後陸續有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合併爲華北解放區，兩地原有貨幣規定比價互相流通，並成立華北銀行。山東的北海幣與華北區的貨幣、西北農幣與華北貨幣、亦都規定比價互相通用；繼而北海幣與華中幣又宣佈等價通用。這樣就完成了華北、華中、西北三大解放區貨幣統一的初步工作。然而，由於各種貨幣種類複雜，幣値不一，換算麻煩，各解放區政府，爲要解決這些困難，經會商由華北人民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發出佈告：「爲適應國民經濟建設之需要，茲商得山東省政府、陝甘寧邊區政府、晉綏邊區政府同意，決定統一華北、山東、西北三區貨幣。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爲中國人民銀行，以華北銀行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所有三行發行之貨幣及其對外之一切債權與債務，均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承受……」。從此，統一的新幣——人民幣——逐漸代替了各樣的舊貨幣，更逐漸消滅了反動政權下的僞貨幣，成爲東北以外各解放區的合法貨幣，成爲全國通行的本位貨幣。從此，舊中國殖民地化的貨幣系統算是結束了它的歷史地位，新中國獨立自主的貨幣制度算是開創了它的新紀元。

二 人民幣的階級性

自從原始共產社會解體，人類社會即發生了階級對立。在政治上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經濟上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在階級社會中，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商品經濟一天比一天頻繁起來。當作商品交換的中介，當作價値尺度的貨幣，也就應運而生。貨幣是商品社會的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它是一貫地爲剝削階級服務的。歷史上的貨幣，都是統治階級作爲鞏固政權和榨取人民的手段。貨幣原是特定階級征服其他階級的重要武器。

在奴隸經濟時代，奴隸主會利用貨幣，換取更多的奴隸，以貨幣作工具，宰割小生產者，壓迫自由民，並以貿易方式掠奪海外人民的財富。在封建經濟時代，領主會以地租形態，加强榨取農民生產品，以之向商人換取貨幣，作爲自己奢侈生活及軍政費用的開支。同時，中世紀商人又利用貨幣經營高利貸，不斷榨壓手工業生產者，使之破產。在中國自秦漢以來，封建地主即與高利貸者結爲一體，利用貨幣壓迫個體生產者及農民，更爲悲慘。在資本主義經濟時代，資產階級刻毒地利用貨幣榨取無產階級，掠奪殖民地人民。通貨膨脹，固然是一種强制借款，非常課稅，使人民大衆的生活極度惡化；而通貨緊縮，除有利於大獨佔資本家而外，對一般勤勞人民仍然是有害無益，仍然是剝削貧苦大衆的方法。近幾十年來國際貨幣領導權的爭奪，弱國貨幣制度依屬於强國的貨幣系統，乃是帝國主義以貨幣作手段，吮吸弱小國家膏血的露骨表現。

同樣，國民黨反動統治，是舊世界的一環。它所發行的貨幣，是維持帝國主義侵畧勢力、鞏固封建剝削、加强官僞搜括的工具。二十二年來反動政權的通貨，是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效忠的，是把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榨取對象的。結果，人民的三大敵人是肥胖了，創造財富的人民却陷於飢餓、死亡線上。一邊是揮霍無度，一邊是飢寒交迫，財富集中與一貧如洗的對照，階級對立尖銳化的情形，是反動政府假手通貨完成這一社會分解過程的。貨幣的作用，能使一方面落後，另一方面富裕，這是貨幣的階級性。

現在反動政權已被推翻，反動派用以剝削人民的工具——僞幣也被宣告無用；代之而起執行流通任務的是人民幣。它是爲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謀利益的，它是工農及各民主階級征服敵人的金融武器，它是爲多數人民服務，執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槓桿。這一槓桿所要達成的任務，是活潑金融、便利貿易、促進生產，相對的安定人民生活，消除財富過分集中，撲滅商人投機，限制私人剝削，打擊一切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經濟活動，全力扶助國營事業，不斷提高並鞏固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以保證有計劃有步驟地由新民主主義逐漸踏進社會主義的經濟道路。這是人民幣和僞法幣、僞金元券不同的特質和性能。

三　人民幣的戰鬥性

人類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只要有階級存在的地方，就是階級鬥爭的戰場。有時爲要打倒特定歷史階段中主要敵人，數個被壓迫的階級，亦可採取聯盟，共同去對付最反動的階級。例如舊世界民主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曾與農民聯盟反對地主階級，直至摧毀封建政權爲止。俄國社會革命時代的無產階級，亦曾以農民爲友軍，共同推翻了沙皇資產階級的統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爲要貫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任務，必然要以前進的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並團結其他民主階級，組成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但爲要鞏固革命政權，爭取全國勝利；爲要徹底消滅敵人，保障人民權利，也要和反動國家的統治階級一樣，必須動員各種力量，利用一切武器——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去與階級敵人搏鬥到底。作爲價值體現形態看的人民幣，作爲商品計算單位看的人民幣，在人民政府運用下是負有無比重要的戰鬥使命的。

原來，人民幣的前身——各遊擊區的邊幣，對支持敵後抗戰，曾有過很大的貢獻。其後在支持人民解放戰爭中，又盡過極重要的作用。現行的人民幣是從工人階級領導的軍事戰鬥中孕育出來的。爲了配合大軍渡江，直搗國民黨反動派政治中心的南京和經濟中心的上海；爲了組織解放戰爭的經濟，動員物力與財政資源，徹底戰勝敵人，人民幣更建樹過不可磨滅的功績。例如津京解放，物價漲風立刻和緩下來。振奮了新解放區的人心，激勵了解放軍的戰鬥意志，使能勢如竹破地渡過長江天險，解放大江以南廣袤的富庶區域。隨軍而來的人民幣，又迅速地佔領了僞幣的流通空間，不使反動政權的通貨有苟延停留的機會，未使金融及經濟秩序發生混亂，這不能說不是人民幣作戰的勝利。

人民幣佔領了華北、華東、華中各大都市以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動政權所遺留下來金融上的殘兵敗將——銀元、黃金、美鈔等，繼續在暗擊人民幣。在經濟首都的上海，人民幣又負起了與頑强的「金融敵人」作堅苦戰鬥的責任。結果打敗了銀元，戰勝了黃金，取締了美鈔。一言以蔽之，就是擊潰了買辦地主官僚政府時代的太上貨幣，特別是杜絕美鈔流通，斬斷了中國通貨與帝國主義貨幣的依從關係。使人民幣價值，不以外幣爲轉移，不受外幣影響，不仰賴外幣，成爲獨立自主的貨幣，完成中國貨幣史上的民族革命。上海是遠東最大的金融市場，爲全國觀瞻所繫，人民幣在上海作戰勝利，足以影響人心，有助於穩定新解放區的經濟。因此，人民幣在消滅銀元、黃金、美鈔流通之後，繼續整飭陣容，補充自身力量，從東北，從華北，從各老解放區，源源運來大批物資，並以折實儲蓄存款爲後備兵力，向投機的商業資本，向多年來重貨輕幣的傳統觀念，發動劇烈的攻勢，這才穩定了自七月半以後到十月中旬的物價。七月十六日上海折實單位牌價爲七八三元，十月十九日爲七七九元。以米、布、油、煤等日用必需品爲內容的折實單位價格之穩定，是十年來僅見的現象。這是人民幣作戰的又一勝利。

可是，在勝利的穩定期中，也潛伏着不易克服的因素。因爲自九月份起，工業原料上升百分之三十五，出口物資上升百分之四十。九月下半月五金上升六成，紗布亦開始蠢動。至十月下旬以後，漲勢更不可遏。分析這次漲風口貿的原因：（一）華南、西南解放區加速擴大，上海生產品銷路激增；（二）出易轉旺，刺激價格上升；（三）解放區生產建設日益發展，物資需要增加；（四）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尚未完成，下鄉收購農產品的貨幣，很快地回流到都市；（五）商業資本的投機活動又漸抬頭，擾亂經濟秩序。對於這些，人民政府正在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細心部署有利於物價的措施，以加强人民幣的戰鬥效能。

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國民黨時代物價狂漲，主要是來自通貨膨脹；而此次物價波動的特徵，主要是由於某些物資短少，不敷供應而惹起的，發行增加並不嚴重。這有兩個跡象可以證明：（一）在反動時期，銀根愈緊，物價愈疲；銀根愈鬆，物價愈漲。現在，銀根愈鬆，物價反而轉疲；銀根愈緊，物價非但不疲，且還趨漲。（二）人民幣的實物準備——米、布、油、煤在漲風中並未起帶頭作用，而是在其他物價激漲的連鎖影響下上升的，其上漲速度遠落在原料、五金、出口物資之後；這又和反動時期以金銀外幣及民生日用品領導漲價的情形完全不同。在物資存底單薄的基礎上發生的物價變化，是長期戰爭、長期破壞後的必然結果，不是單靠人民幣在短期內所能輕易對付得了的。其實，人民政府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號召精簡節約，就是作爲預防物價波動和鞏固幣值的準備工作。需求與供給失調的關係，給予人民幣的困難，是人民幣在戰鬥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必經的挫折。但就人民幣的整個戰略看，在發展中的客觀基本形勢，是大大有利於人民幣的。當然，我們不能無條件的樂觀，不能輕視「敵人」，人民幣今後在與物價作戰時，將還有吃小虧、受小挫的可能。

「戰敗之軍善學習」。我們要從戰鬥的經驗中，接受教訓，研究受挫原因，分析現實情勢，改進策畧和技術，重新集結力量，一定會再接再勵向艱困環境，向商業資本，向農村，展開戰鬥，以期做到相對的穩定物價，相對的安定人民生活。

四　人民幣的建設性

人民幣的戰鬥任務，是在掃除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道路上的障礙，是在肅清反動派的經濟殘餘勢力，是在摧毀落後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是在把農業國穩步地變爲工業國。人民幣不僅是破壞舊經濟關係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建設新經濟制度的武器。破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結構，是建設獨立自主人民經濟的前提條件。人民幣在打擊敵性經濟的進度中，已經不斷地爲新經濟立下了初步基礎。這是人民幣的辯證發展。

人民幣建設能力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物價——尤其是民生日用必需品，比僞金圓券時代穩定得多了。上海解放到今天剛剛半年，米上升二十一倍，布上升二十二倍，油上升二十五倍，煤上升二十一倍。較之上海未解放前，即從去

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今年五月十七日這六個月（上海是五月二十七日解放的，最後十天，市場混亂，故拿前十天價格計算）米上漲九萬六千六百多倍，布上漲五萬六千二百多倍，油上漲十七萬三千九百多倍，煤上漲三十七萬五千多倍，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人民幣建設能力的另一表現，就是交通和生產不斷在進展之中。新舊解放區的鐵道、公路、水運等恢復情形，根本不是國民黨時代所可比擬，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生產方面，單就上海來說，據上海市工商聯合會十月二十一發表的統計數字，自七月份起，四十二種重要工業生產品的開工率，每月均有顯著的增加。又據十一月十七日新華社上海訊：中紡公司各工廠開工率不斷提高，九月份各部門的產量，如與上海解放前的五月份比較，計棉紗增加百分之四十五，棉布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加工布增加百分之七十六，毛紗增加百分之九十，蔴袋增加百分之二百六十，絹絲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絲織品增加百分之九十二。全上海五十五家私營紗廠生產情况，亦在好轉中。自十月份起，各廠開工率自每週三日三夜增至四日四夜。十一月第二週起，各廠平均開工率又增至四日五夜。私營紗廠的開工紗錠，已佔全部可運轉紗錠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再就私營銀行放款說，上海商業、中國通商、浙江興業、中南、新華等較大銀行的工業放款，佔放款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金融業務與工業結合的情形，是從未有過的新氣象。

人民幣原是以支援前線爲第一義的，現在全國解放戰爭接近尾聲，整個中國大陸將要進入生產建設的高潮。斯大林說：「貨幣原是資產階級經濟的一種工具，但蘇維埃政府把它握在自己的手中，並使之適應社會主義的利益，就是爲了盡量發展蘇維埃貿易，藉此準備直接的生產品交換的條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貨幣原是反動派經濟的一種工具，但人民政府把它握在自己的手中，並使之適應新民主主義的利益，就是爲了盡量發展生產，繁榮經濟，藉此準備直接的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所以人民幣是爲建設新中國而被利用着，它完全是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是建設性的革命的貨幣。

五、人民幣的物質基礎

貨幣的本質與任務，一般說，是由社會生產方法、社會階級關係、和經濟發展的規律來決定的。人民幣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即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走向社會主義生產之過渡的人民經濟時代的通貨。掌握人民幣的是工人階級，主要是爲工農及其他各民主階級服務的，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重要槓桿。在理論上，人民幣是屬於新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而不是依附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範疇的。資本主義國家，保證貨幣穩定的物質基礎，是金銀準備。社會主義國家，保證貨幣穩定的物質基礎，並不過份重視金銀儲蓄。「蘇聯幣制的穩定，首先是由國家所支配的大批商品來保證的。這些商品是依照穩定的價格投入商品流通的。哪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否認這種在蘇聯僅有的保證，是比任何黃金儲備都更能切實保證貨幣的穩定性呢？」（斯大林）。貨幣的商品保証，是最堅固最實際的保證，是社會主義的嶄新的貨幣理論。

中國是「以蘇聯爲師」的，在貨幣方面也是如此。所以人民幣不是金銀本位的貨幣，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或者說從它的胎兒時代（各解放區的地方性貨幣）開始，就與金銀完全脫離關係。因爲金銀是飢不能食，寒不能衣，而與勞苦大衆無緣的東西。人民幣不是外匯本位的貨幣。依靠外幣作爲發行準備，仰賴外匯來穩定幣值，是附庸性的殖民地化的貨幣，不僅違反經濟自主的原則，而且有背人民革命的本義。人民幣乃是解放後獨立自主的管理通貨，它的物質基礎主要是依靠民生日用必需品，以及其他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它的發行在原則上是和生產聯系的，大體是根據生產狀况和流通需要來決定發行數額的。但是，當一切爲着前線的時候，當國家經過空前的戰爭大破壞之後，我們從舊時代得到的遺產，是赤貧的人民破產的經濟，千瘡萬孔的社會。在這種苦難的環境下，人民政府手中握有的商品或實物，無可否認的是並不充裕，也不能不影響到人民幣的購買力；這是物價一時不易達到絕對穩定的基本原因。只有等到生產恢復到戰前形態，人民幣值才能獲得眞實可靠的穩定的保證。

人民幣既不需要金銀準備，那麼金銀在中國豈不是成爲無用之物了嗎？這又不然。人民政府仍然是珍惜金銀的，仍然重視金銀儲備的。因爲在目前，金銀還是公認的世界貨幣。它可以充當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支付工具，可以充當出口的商品，以之換回更多的器材，用之於建設事業，以加強經濟力量，簡直也可以說等於提高人民幣的幣值。所以政府儲蓄金銀，是應當的，是必須的，這是穩定貨幣的後備基金。

六、結論

人民幣是羣衆的貨幣，是爲工農大衆謀利益的信用工具。在它無法避免的受難（貶値）趨向中，社會上並沒有發生大批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不公平現象。反之，却藉折實存款的方式，保障了廣大工人薪給人員的生活水準，且又促進了國民經濟的逐步好轉。只要我們能掌握馬列主義的科學理論，依靠人民；只要人民能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信任政府，我們一定能利用人民幣作爲改造舊經濟的武器，來加速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偉大的建國任務。

一九四九、十一、二七於上海

論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

樓邦彥

城市和鄉村的物質基礎是基本上不相同的，因此政權組織形式在原則上就應該跟着適應。拿城市來說，重要的問題是在於我們應該根據它的那幾種具體特點，來確定它的政權組織形式。

具體的情況是這樣：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的一段時期內，各城市已早被

弄成一團糟了，現在是要在這些城市中被摧毀的反動政權的廢墟上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權，然而廢墟堆裏還遺留着「一些舊的殘滓」，同時新人所携來的又是一些「農村分散的比較單純的習慣與經驗」。於是嚴重的問題就產生了：城市的物質基礎決定一定的城市特點和要求，而爲適應這些特點和要求，那些舊的殘滓固然必須澈底澄淸，同樣的，那些農村分散的比較單純的習慣與經驗恐怕也不能機械地用來完成任務。這是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新舊間和城鄉間的矛盾，這也就是城市政權問題的基本關鍵。

一　京、津、哈三市關于區街組織的演變經過

我們這裏姑以北京、天津、哈爾濱三大城市爲主要實例，舉出在過去一兩年中政府所認爲的城市具體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集中」。這可以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改革區街政權組織及公安局派出所的決定」中的一段引語來說明：「現代城市的重要特點之一是集中。人口集中，政治、經濟、文化亦集中，各種交通極爲便利，而主要羣衆是集中的工人階級。這與人口分散、交通不便，而主要羣衆又是分散的農民階級的鄉村，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個特點是「複雜」。這可以拿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哈爾濱市政府「關於健全組織領導中的一些問題的指示」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城市各階層所表現的特點，其本身都有其一定的認識水平，，階級間的鬥爭也比較複雜，日常所反映出的問題很多，所牽涉的範圍亦較廣，這就不是一攬子或拉單線的方式，可以担當着這個複雜任務的，因此，必須要有組織的嚴密分工，要有集中的統一步調。」

第三個特點是「快」。這也可以拿哈爾濱市政府同一個指示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城市人民的時間要求，亦不同於農村，後者由於農村生產季節性的經濟條件所養成的習慣，在珍惜時間上來說，遠不如城市人民的追切。加上城市許多交通設備的條件，故城市人民反映問題很快，要求解決問題亦要快。因此，肩負着人民城市的幹部，在工作中，珍惜人民的時間，也是城市羣衆觀念中的一個具體內容。」

爲適應城市的「集中」、「複雜」和「快」三個具體特點，三大城市曾對於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有過甚麼樣的改革呢？這是首先值得我們來加以敘述的。

先說北京市和天津市。這兩大城市的解放，快滿一年了，在這個時期中，關於它們的政權組織形式，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從解放以迄六月下旬止，這是城市政權採取市、區、街三級組織的時期；後一時期是從六月下旬以迄於今，這是「市級爲城市工作之基本單位」和「警政合一」的時期。前一時期的情況，可以用下列北京市軍管會「關於改革區街政權組織及公安局派出所的決定」中的一段話來概括：

「在我們入城之初，因爲和平接管的北平，社會情況複雜。匪特與流散軍人事前已有計劃的潛伏，工人階級絕大部份尙無組織，龐大的舊警察機構和人員尙來不及改造，各區都以少數老幹部和大批工人、學生、積極份子組織工作組，派遣到各保工作，負責調査和了解了城市一些情況。宣傳了黨與政府的政策，反映了一些市民的要求，負責進行了兌換僞金元券、發救濟糧、肅淸散兵游勇、淸除垃圾、粉碎保甲制、評定若干稅收等項工作，與羣衆建立了聯繫，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

在這個時期內，由於引語中所說明的實際情况，京津兩市皆設區的政權組織，區之下則建立街政權，並將區街政權作爲城市政權的一級。到了六月下旬，天津市和北京市先後作了改革區街政權組織的決定，歸納起來，它們的決定是基於下面幾個原因：

（一）對於城市各種情況已逐漸有了瞭解。

（二）公安下層機構已經有了一定的轉變。

（三）機械地搬運鄉村中的一套到城市中來，把鄉村的政權組織形式適用到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上去，是不合適的，因爲：「一則在鄉村中，鄉（村）的政權和羣衆組織都是基礎的一級，而在城市中，「一切工作應盡量集中於市一級來進行，否則就會把應該由市政府（或市工會等）集中統一決定和進行的工作，錯誤地加以分割，造成在工作中很混亂的現象」；再則城市人口集中，交通方便，市一級的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不但可以而且應該盡可能地採用直接的工作方式」，庶幾避免「政出多門」、「步調紊亂」和「工作效率遲緩，及錯誤百出的現象」。（本節所引各段都是北京市軍管會的決定中的話。）

由於這些原因，天津市和北京市先後作了決定，使這兩大城市在政權組織形式上，進入了入城後的後一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兩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簡括的說，有下面幾個特點：

（一）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根據「市級爲城市工作之基本單位」和「警政合一」兩個基本原則。

（二）取消街政權，改造和加强公安局派出所。改革的結果，天津市共設了二百七十二個派出所，北京市在城區十二個區範圍內，把全部的一百六十二個街政府和五十四個警察分駐所都取消了，同時改造和加强了二百十八個派出所（包括城門檢査站、市場派出所和交通派出所等）。

（三）把區政府改爲區公所，確定爲市政府的派出機關，非城市政權的一級，而爲市政府執行工作的助手，向市政府負責，並經常反映情況，發現問題，提供意見，以爲市政府決定和推行政策時的依據。

京津兩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演變和目前情況，大體就是如此。

再說哈爾濱市。哈爾濱市建立民主政府，歷史較久，在政權建設的工作方面，經驗要比別的城市豐富。在民主政府建立以後，哈爾濱市的上下級層次，形式上是市、區、街三級組織，而以街爲政權的基層組織。根據一九四七年五

月二十三日哈市臨參會第一屆常會修正通過的「哈爾濱特別市街政權暫行組織條例」第二條的規定：「本市政權之基層組織爲街，街政權行政管轄區域以人口多少和街道大小來劃分，人口一般規定爲五千人至一萬人，街道爲二條或三條，過於長大的街道，得酌量劃分爲兩個行政區。」街政權的任務包括執行施政綱領和上級政府的法令指示，建立人民自衛武裝維持社會治安，調解市民糾紛，評定房租並調查房產，辦理衛生、教育、水電等有關人民生活的公益建設，進行街人口及一切社會調查登記事項，組織及指導人民生產及合作事項等。街設代表會爲街政權的最高機關，街代表會選舉街長及街政委員會，在上級政府的領導下，統一領導本街的一切行政。街政府之下設閭，每閭管轄五十戶至一百戶，由閭民大會選舉閭長一人，在街長委員會及街長領導下，辦理本閭的行政。閭之下又設每四十人至六十人自由結合的公民小組，它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選舉代表組成街代表會。

哈市實行了這樣的制度以後，形式上雖是市、區、街、三級組織，實際上街之下的閭和組也都起了一級政權的作用，於是就產生了「說的和做的不一樣」、「下情不能上達」、「各級組織的幹部配備上，愈向下愈不够健全」等嚴重缺點。在經過檢討以後，哈市政府乃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對政權組織形式作了如下的調整決定：市之下區的領導單位，一般的每區以二十個左右街村（在市區是街，在郊區是村）、三萬至九萬人口爲標準；區之下街的領導單位，由各區根據實際情況與條件加以縮小，一個街以八百戶至一千二百戶、二千至五千人口爲標準；爲減少領導層次，閭的組織予以廢除；爲發揚民主精神，各街村公民每二十五人至五十五人（相當於八戶至二十戶）以自由組合的形式，組織居民小組，它不是行政的一級，而是負有輔助行政和推行政策法令的義務的民主的基礎組織。調整的結果，全市政權基層組織的街，從八十四個增加了一百五十一個，居民小組的總數是五千一百八十四個，每一個街的平均戶數約一千，平均人數約四千，每一個居民小組的平均戶數爲二十二，平均人數爲八十二，平均公民數爲四十一。

調整後爲時一年，繼天津北京兩市之後，哈市對於區街組織又決定予以根本改革，認爲「把街劃小改爲街政府，當做城市一的基層政權是錯誤了」。在指出過去街的工作有成績並起了一定作用之後，哈市人民政府在「關於街組織變更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中說明了取消街政府的幾個主要原因：

（一）今後城市的主要工作是組織生產，街一級的政權和羣衆組織根本就不應設立，而應由市政府集中統一決定和進行工作；

（二）過去把街向着城市政權中一級的方向發展，經驗証明街人民代表會議不能解決許多問題，因而逐漸流於形式；

（三）爲了機構簡便，應把街一部份工作交給公安局派出所，派出所應向民警方向發展，有民主作風，同樣能聯繫羣衆，而使羣衆能獲得許多方便。

下面一段話可以說是哈市人民政府關於改革區街組織的總的結論：「簡單說，從政權的內容，政權的形式，政權的支柱以及政權的領導各方面來說，從哈市，建政過程中經驗證明：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是集中的，一切政務應該集中於市，如果我們要按地域將城市分割開，就破壞了城市經濟、政治、文化、工人力量的集中統一與完整性（而且這種分割的單位愈小，則城市的集中統一的完整性破壞愈大），所以哈市的政權只能是一級，而不能是三級，只能市爲一級政權，區街不能作爲一級政權，區街只能是一定時期的過渡的一種組織形式，政治任務改變之後，在目前羣衆組織較有基礎，市政機構日益健全的情況下，特別根據城市的特點亟應變更街（區亦同）的組織。」

哈爾濱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演變經過和目前情況，大體就是如此。

總結京、津、哈三大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演變經過，可以見到在改革以前，哈爾濱市已具備了民主的區街政權組織的條件和形式，而北京市和天津市所實行的，還是以幹部爲主體的區街政權。以天津市爲首，這三大城市已先後取消了各自成爲政權一級的區街組織，像這樣的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目前實際上已普遍地爲全國各解放了的城市所採取。現在中央人民政府業已成立，它可能即將根據經驗和需要，來制定關於城市政權組織的統一法規。我們願意趁此時機對還個問題提出討論，大家廣泛提出意見，可以有助於解決當前的這個重要問題。

二　對于改革區街政權的主要論據的檢討

我們認爲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一般的主張凡是城市的市級以下的區劃一概不能成爲一級政權，這種看法是有商討餘地的。對於現代城市的認識，絕不可能像對於以個體經濟爲主的鄉村的認識那樣的簡單，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全用衡量鄉村的標準來衡量現代城市。鄉村的一套固然不能生硬地搬到城市來適用，但是認爲在城市裏一定要適用與鄉村完全對立的特別的一套，也是有偏差的。一切的方法必須靈活地加以運用，而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問題是在於具體分析和個別瞭解城市的特點。祇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從事於有關城市政權的計劃的草擬和方針的訂定。

下面我們首先就京、津、哈三市根據城市特點改革區街組織的主要論據來作一番檢討。

第一，城市的集中特點究竟與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發生了甚麼樣的關係？我們認爲城市的政權組織的形式雖然應該適應城市的集中特點，但是城市的集中特點不應該是政權組織形式的決定因素。我們的理由是：

（一）鄉村的人民分散、經濟分散、村莊分散和城市的人口集中、經濟集中、地區集中確是客觀的事實。但因此說鄉村要成立縣、區、村三級政權機構去聯繫農民羣衆，而城市就必須把一切工作的決定權集中於市級政權機構，好像僅僅由於人口集中、經濟集中、地區集中的客觀事實，而羣衆就當然會同市政府發生了聯繫，這種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三級制在鄉村是實行得有效果

、有成績的，但它不一定就是專適用於鄉村的政權組織；不同於鄉村的城市實際情況也可以要求在市級之下另設政權機構，這不一定，依照各方面的檢討結果來說，就是機械地、錯誤地把鄉村政權的組織形式搬到城市中來。類似的組織形式；一般的說，是可以靈活地運用在不同的環境中，而起一定的作用的。此其一。

（二）如果根據各城市的經驗總結，在實行市、區、街三級政權組織形式的過程中，發現了「政出多門」、「步調紊亂」、「工作效率遲緩」、「錯誤百出」等毛病，而認爲城市既然具有人口集中和交通方便的特點，就應該取消區街政權，由市級政權機構盡量直接行使職權，這種看法也是可以商討的。工作中的毛病，可能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過去城市政權工作假使存在着各城市檢討結果所認爲的各種毛病，不一定是由於在人口集中的條件下實行三級制組織形式的緣故。不但「步調紊亂」、「工作效率遲緩」和「錯誤百出」恐與組織形式不發生必然的因果關係，就是「政出多門」也可以用別種制度來補救的。如果爲了存在着「政出多門」的毛病就想到一定是區街政權在作祟，那麼假使推而廣之，爲了沒有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搞好，也產生了「政出多門」的毛病，我們是否乾脆就一方面把事權完全集中到中央政府而另一方面取消所有的地方政權呢？當然不能的。因爲這無異是因噎廢食了。此其二。

第二，在市級之下另設政權機構，是否若非「各自爲政」，即將「流於形式」？我們認爲未必一定這樣。在城市中的各區街內有工廠、銀行、學校等，根據它們的性質，姑不妨規定由市級政權機構來統一管理，要不然，如果讓市級以下的政權機構來分別管理的話，就可能犯「各自爲政」的毛病了，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們知道，在市級之下另設政權機構的原因並不是爲了要讓它們管理原則上應由市級政權機構統一管理的事項，也並不是爲了存心要造成城市中的無政府無組織狀態。恰恰相反，在市級之下另設政權機構可以使政府與羣衆更爲接近，可以有組織地嚴密分工，並可以產生集中的統一步調。祇要事權劃分得明確，制度運用得適當，不但不致脫離羣衆，反而會發揚市民羣衆的積極性；不但不致助長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作風，反而會增進工作效率並迎合一般市民羣衆對於時間的不同於鄉村中農民羣衆的要求。同樣的，在明確地劃分了事權和適當地運用了制度以後，市級以下的政權機構解決不了問題的情事恐不致再發生，因此也不致於會「流於形式」。所以，市級以下的政權機構假使竟然「各自爲政」或「流於形式」的話，那是與它們的設置與否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在城市中設置市級以下的政權機構並不一定非「各自爲政」即「流於形式」。

第三，「警政合一」是不是城市政權工作可依據的一個最合適的原則？我們認爲這一點也是值得大家來認眞研究的。「警政合一」是京、津、哈三市改革區街組織的主要論據之一，它們一致認爲：在入城之初，龐大的舊警察機構和人員一時不及改造，因此不能不在剛解放後的一段時期內採取了一種過渡性的區街政權組織。後來情況變了，一方面對於城市各種情況已逐漸有了瞭解，另一方面公安下層機構也已經有了一定的轉變，因此就應該把區政府改爲區公所，成爲市政府的派出機關，並加强公安局派出所，使其向民警方向發展，密切與羣衆聯繫，這樣，警區與行政區就可以合一起來，共工作也可以盡量統一起來，而做到了「警政合一」的地步。

應當首先指出，澈底粉碎舊的反動警察制度和有步驟有計劃地建立新的人民公安系統，是完全正確絕對必要的。正如北京市在關於改革區街政權組織的決定中所說的：「反動政權系統下的警察組織，是人民死敵。人民政權系統下的的公安組織，乃是人民大衆的警衛員，亦即人民政府管理城市、實現人民民主統治的重要的武器之一。……目前應該繼續澈底改造派出所，政府應派大批的得力幹部與革命的工人和學生到派出所去，並吸收舊警察中經過改造可以忠實爲人民服務的份子，健全派出所。只有這樣，公安局才能密切聯繫羣衆，依靠羣衆來實行人民民主的統治，並有效地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同時我們完全同意在一定條件下，特別是在軍管期間，反動份子需要鎭壓、特務需要肅清、革命秩序需要有系統地建立……等條件下，城市政權工作採取了「警政合一」的原則，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但是必須指出，「警政合一」祇是在一定條件下能起很大的作用的。我們都重視建立一個符合人民政權的新的公安系統，並把它當作在城市中實現人民民主統治的重要武器之一，但是「警政合一」並不是要做到這個地步的唯一手段。顧名思義，警察是「人民大衆的警衛員」，公安組織的主要任務是應該偏重於消極方面的，實際上它亦恐怕祇適宜於執行消極方面的任務，例如肅清敵特及其他反革命份子、清除盜匪及其他破壞治安份子、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管理交通秩序、處理違警事件……等。至於一個新國家，一個現代城市所應執行的各種積極方面的任務，在分工原則越是趨向於細密的情形下，沒有理由非要做到「警政合一」的地步不可，也沒有理由非要讓公安組織去執行不應該、同時也不適宜於由它執行各種積極方面的任務不可。無論就現代城市的性質或公安組織的使命來說，與其允許公安組織兼顧管事的（積極的）工作而不發生高度的作用，毋寧僅令公安組織祇負實管人的（消極的）工作而盡量發揮它的本分的效能。這個原則可以適用於整個的公安組織，同樣也可以適用於城市中的基層公安組織派出所。公安系統中的派出所自然應該隨時密切聯繫羣衆，但是這並不是說在密切聯繫了羣衆接近了羣衆以後，派出所就可以成爲城市中唯一的或主要的基層組織。現代城市是需要以現代組織原則把它組織起來的，現代組織原則，簡單的說，一方面是「細密的有組織的分工」，另一方面是「集中的統一領導」，我們認爲「警政合一」是與這個原則不盡符合的。

三　關於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的幾個原則性建議

以上我們已把以京、津、哈三市爲代表的改革區街組織的主要論據分別加以討論，還要讓我們進一步對於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提出幾點原則性的建議，

以供政府的參考，並希望引起各方對於這個問題的廣泛討論。

第一是關於基本原則。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應根據的基本原則，很顯然的就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說，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應該澈底配合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同時盡量地發揮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共同綱領第十五條這樣規定：「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則為：人民代表大會向人民負責並報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員會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委員會內，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各下級人民政府均由上級人民政府加委並服從上級人民政府。全國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從中央人民政府。」在這裏姑暫不提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的一面，若單就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的一面來說，它確實是應該在地方政權中特別加以照顧的重要問題，在城市政權中，自然也是如此。為此我們特別要強調下面兩點意見：

（一）消極方面，我們認為在城市政權中應該逐漸放棄以幹部為主體的工作方式。實在說起來，除開改革前的哈爾濱市區街政權應另當別論外，京津兩市，在改革以前，其區街政權乃是以幹部為主體的，它們儘管「與群衆建立了聯繫，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但事實上並沒有真正做到了（固然條件或許尚未成熟）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的一面；同時又因為市、區、街各級政權的事權範圍並未明白劃分清楚，領導關係也不夠健全，於是在日常工作中就形成了「政出多門」和「步調紊亂」的現象。像這樣的區街政權，根據行政原理來說，是屬於「分治」（即歐陸行政法學上所謂「de'concentration」）的類型，即一方面人民未能直接參與行政，另一方面上級也不能統一加以領導。在改革以後，區街政權取消了，區政府一律改為區公所，公安局派出所並予以加強，區街工作依舊以幹部為主體（區公所的幹部以及公安局區分局和派出所的幹部），人民還是未能直接參與行政，祇是市政府把權力集中了，可以直接對於直屬各區加以領導。像這樣的制度，根據行政原理來說，是屬於「集權」（即歐陸行政法學上所謂「centralisation」）的類型。為了要澈底地配合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並盡量地發揮民主集中制的精神，無論是過去的類型，還是現在的類型，以幹部為主體的工作方式，都應該逐漸從城市政權中被放棄掉。這是一方面。

（二）積極方面，我們認為在城市政權中應該盡可能鼓勵城市居民的積極性。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的一面貫澈在城市政權中，主要的必須依靠城市居民的積極性。光是培養一批為人民服務的幹部，並令其在城市中執行政權工作時密切聯繫羣衆接近羣衆，那還祇是片面的、自上而下的努力，這樣做是不夠的。目前政府的既定政策是在人口三萬以上的城市一律應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以為現階段人民政府與各界人民群衆發生密切聯繫的機關；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這樣的機關可以「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並從而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這是完全正確的。其實，這個政策不但應適用於整個的城市，而且還應根據客觀情況適用於城市中市級以下的區域，庶幾城市政權全面地、不分層次地都成為人民的政權，大大地發揮市民的積極性，而使各種具體的城市工作都成為市民直接間接參與活動的結果。這是又一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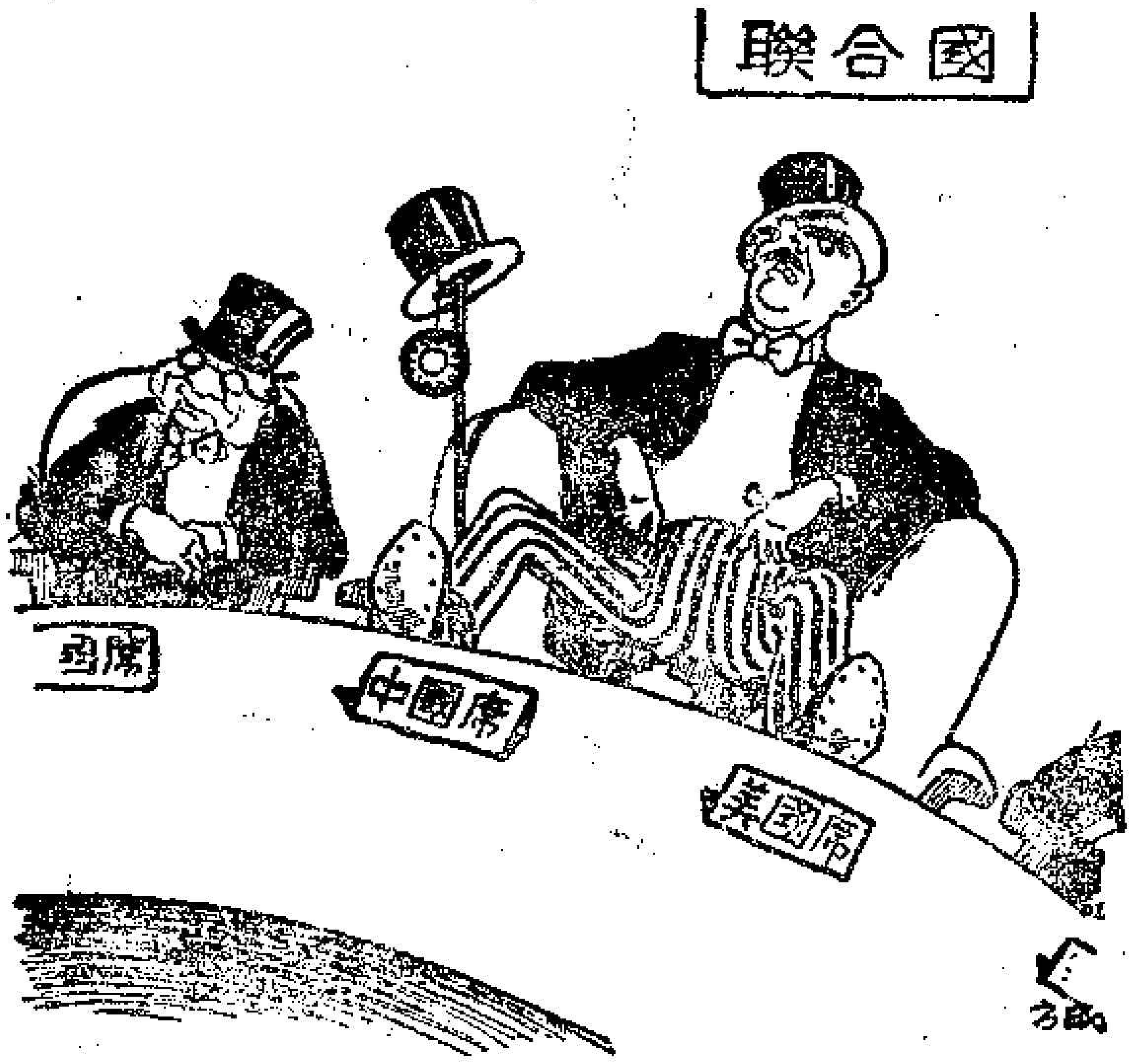
下面的幾點原則性的建議都是從上述的基本原則出發的。

第二是關於政權的級別。這不是純行政技術的城市中的行政區劃的問題，而是城市政權應分多少級和應怎樣分的問題。上面已經說過，我們不主張凡是城市的市級以下的區劃一概不能成為一級政權，這就是說，我們不認為籠統地規定「市級為城市工作之基本單位」是一種很正確的看法。城市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工商業怎樣發展及其發展的方向，決定一定城市怎樣發展及其發展的方向。因此各城市的情況是不同的，國家對於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雖有統一規定的必要，但必須在統一規定中允許適當的彈性，來適應各個城市的特殊情況。單以人口的數量為標準來說，六百萬人口的上海市，二百萬人口的北京市，二十萬人口的石家莊市，以及三五萬人口更小的城市，當然不應該，也不可能，適用完全一致的政權組織形式。我們認為在一定的條件下，並經過一定的步驟，城市可以在市級之下另設區級政權；但街級政權則似乎並無必要，因為現代城市的物質環境並不要求幾千幾百人口自成單位構成一級政權。所謂一定條件，主要的是指人口數量，此外還可以考慮包括人口素質、地區大小、城市性質……等。所謂一定步驟，可以指明在具備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城市的人民代表會議如認為必要，得議決在市級之下另設區級政權，以便貫澈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但同時又為符合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起見，此項決議應呈請上級人民政府的批准，方能生效。

第三是關於職權的劃分。假使城市政權分為市和區兩級，則立刻就發生了如何劃分兩級政權的職權範圍的問題。職權的明白劃分是絕對有其必要的，不然，城市政權的級別根本就不具有絲毫的意義了。「政出多門」如果是指兩個以上的機關對於同一事件皆可作決定，那就形成了無政府無組織的狀態；「政出多門」如果是指兩個以上的機關同時存在，而各在法定的職權範圍內對於不同事件分別作決定，那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好的作用的。城市政權分為市和區兩級並明白劃分其職權，表面上也是「政出多門」，但那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好的作用的後一種「政出多門」。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區內，對於同一事件採取不同的做法，並不是一個絕對的缺點。譬如拿城市的街燈來說，在繁華的商業區，由於各商店從傍晚開始就會把各種燈光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樣，那麼在那個區域內，街燈在一定時間內可以不開亮，藉以節省電力；而在住宅區，情形就不相同，街燈必須一到傍晚就要開亮。像這樣的做法不一致，是完全合理的。因此，如果街燈的管理為區級政權的職權，各區政府就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各自決定街燈的開閉時間，那麼雖然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因為有了區級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步調紊亂」的現象，但是那與其說是「紊亂」，毋寧說是實際情況所要求的合理的不一致。街燈如此，不少其他的事情亦復如此。在劃分市和區兩級政權的職權範圍的時候，凡是各區根據實際情況可以有不同規定的事

觀察漫畫

1949.1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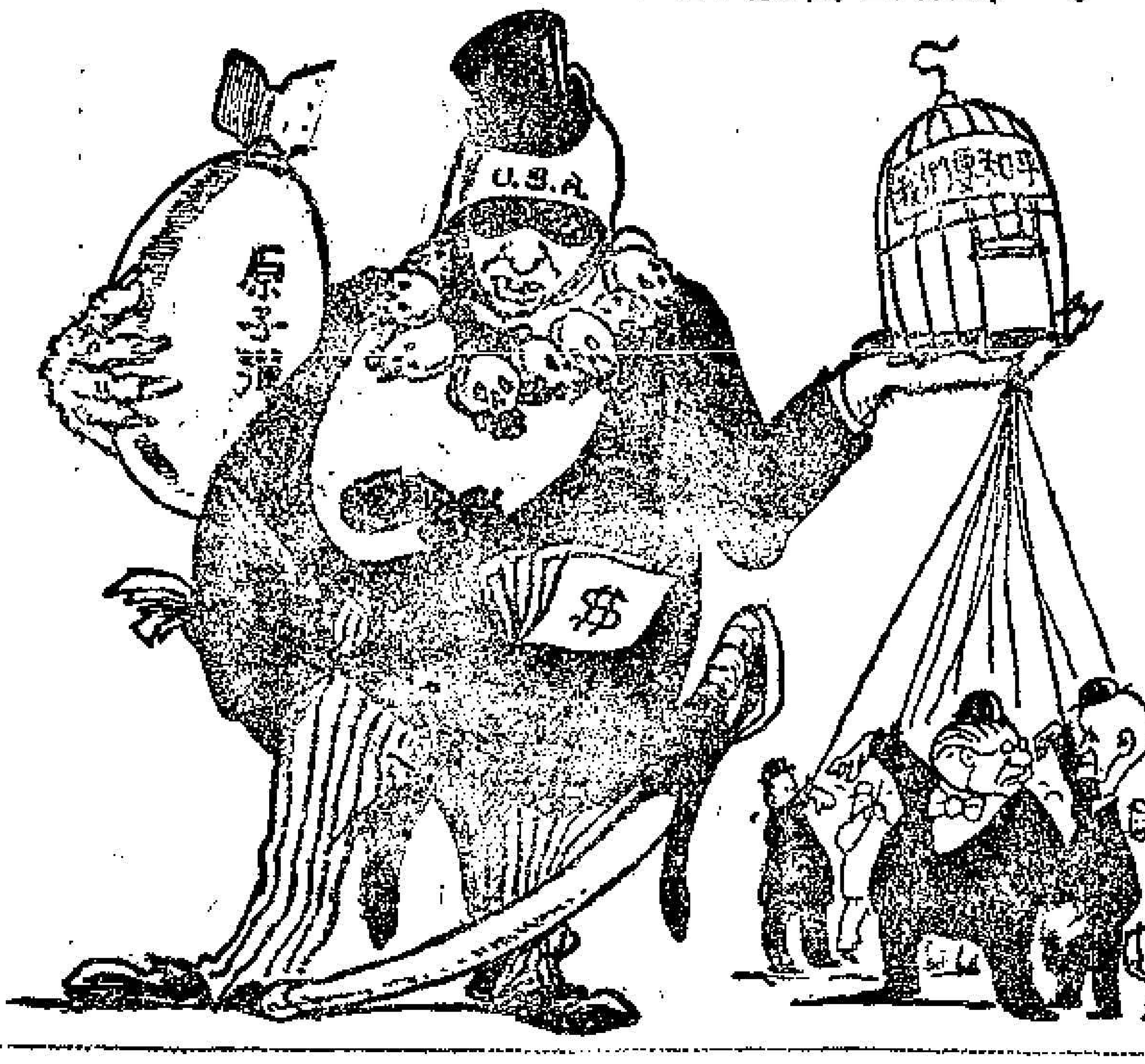


↑ 被侵佔了席位

↑ 為了和平，不要放鬆！

↓ 華爾街老闆及其『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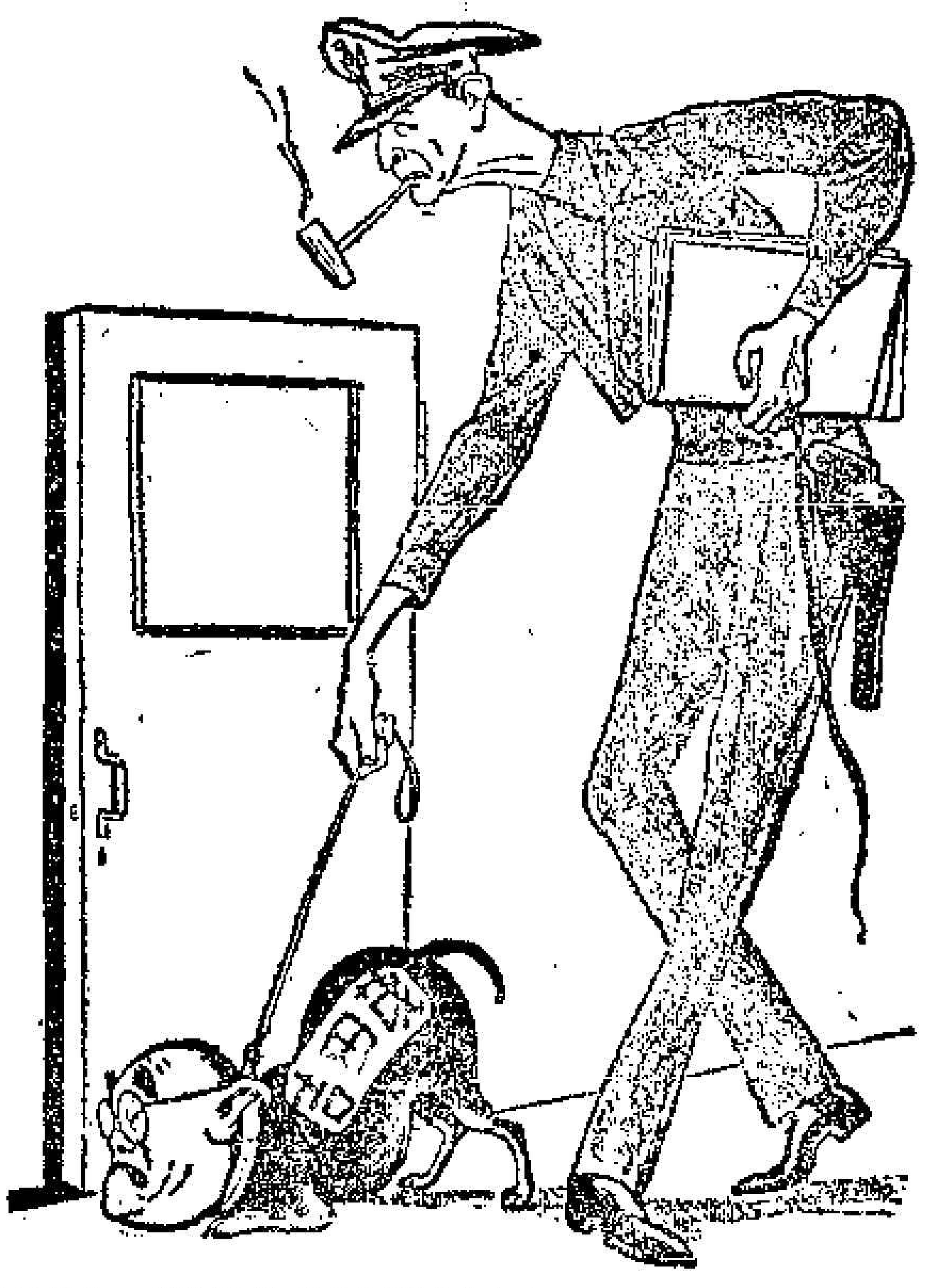
蘇聯葉菲莫夫作



↑ 戳穿帝國主義的陰謀

↓ 主人及其狗

蘇聯庫克里尼克希作



項，或分別由各區辦理可以比較便利、有效率、或更符合人民要求的事項，應一律列在區政權的職權範圍以內。職權的劃分應以市級政權機關的決議爲依據，但在原則上，此項決議亦應呈請上級人民政府的批准。

第四是關於領導關係。城市政權中的領導關係，其目的是在貫澈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的一面。領導關係是相當複雜的一種制度，這裏我們祇能涉及有關市和區兩級政權間的領導關係的幾個原則性的意見：

（一）在普選的區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區人民政府在原則上應由市人民政府任免，但如果條件許可，市人民政府得根據實際情況，決定由代行區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區人民政府，但仍須由市人民政府加委。

（二）區級政權機構應服從市級政權機構，市級政權機構得廢止或糾正區級政權機構的決定。

（三）市級各局院依據既定政策在主管業務範圍內對區加以指導，並得依職權停止區政權機構的決定之執行或提出糾正的建議，但同時須呈請市人民政府作對於區政權機構的決定應否加以 廢止的決定。

以上我們是根據有限的材料，就原則對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譬如我們所建議的在一定條件下的城市得呈請上級人民政府建立區級政權這一點來說，在目前的情況下，決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要在城市中建立區級政權，首先必須劃分市區兩級政權的職權範圍，但是我們現在連一般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尚未確定，自然一時尚難進一步考慮到市區兩級政權的職權劃分問題，何況有了區級政權的存在，稅收的劃分或財政的分配也需要跟着解決，這也是一個不甚簡單的問題。然而必須指出，關於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的確尚存在着不少可資研究的問題，我們寫成此文，除開提出了一些有關意見外，主要的還在希望引起多方對於同一個問題的建設性的討論。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北京

政治熱忱與科學熱忱

盧于道

新中國一切建設事業，包括生產建設和文化建設，都非常需要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科學工作，這是大家都瞭解了。「科代」（就是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的目前工作，如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登記工作及將來代表產生工作，都是走向這個目標的。可是根據現在上海「科代」實際上進行登記工作的經驗以及朋友方面所聽到的談話，對於這個登記工作還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們對於科學參加建設工作的遠景，固然是滿腔熱誠，可是假如我們在出發的時候就沒有搞好，則將來一切建設計劃工作計劃，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把「科代」搞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

爲了這個緣故，搞好「科代」，是具有革命性的，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在搞「科代」的時候，首先發現的是大家還缺乏着政治的熱忱。我在這篇文章裏，擬就政治熱忱這一點，談談我個人的瞭解，如有錯誤之處，還請讀者指正。

一 人民統治的政治

在本刊六卷二期費孝通先生論「知識份子與政治學習」一文內，他說到「從統治人民的政權變成了人民統治的政權」，這句話非常簡潔明白，不但是政權如此，就是政治亦是如此。現在的政治和解放前的政治的根本不同點，就是由統治人民的政治變爲人民統治的政治了。

解放以前，科學工作者不高興談政治，不高興參加政治活動，以至於討厭政治，躲避政治，這是可以的；並且如果我們沒有直接參加革命，這麼消極地作亦是好的，是對的。爲什麼呢？那時的政治，是一片烏烟瘴氣，在本質上他是統治人民、壓迫人民的。例如翁文灝是一位科學工作者，他參加政治了，結果怎樣呢？就幫同了反動統治階級統治人民，壓迫人民，以至於他自己亦作了人民的痛恨的戰犯。非但害了人民，亦害了自己，亦害了科學。所謂害了科學，如他在作官以前所主持的地質調查所，非但沒有因爲他作了經濟部長、行政院長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反而因爲他作了大官之後，地質調查的工作被迫而服務於反動統治，例如他們找到了甘肅玉門石油鑛，這就幫助了官僚資本，幫助了壓迫人民的武裝裝備。這就是翁文灝參加反動統治的政治的惡果。

解放以後科學工作者對於政治的態度應當怎樣呢？還要看目前究竟是怎樣一種政治而定。

如果解放以後的政治仍舊是少數人或少數集團統治人民的，這種統治，即使就是不反動、不壓迫人民，你說我不參加統治工作，亦就是說不參加政治，這還有可說；事實上，現在的政治之事，經過革命之後，經過人民翻身之後，完全和從前相反，是人民統治。不反動、不違反人民利益的科學工作者亦是人民，你亦是統治者的主人，因此科學工作者對於政治的態度，亦應當反過來從不參加而積極參加了。

所謂人民「統治」，「統治」二字含有政權的意味。我們掌握有「政權」，消極方面說起來，是鎮壓反動派，消滅反動殘餘，因爲反動派是禍國殃民，破壞人民利益的；積極方面說起來，要把國家治得好，要把交通、工業、農業、醫藥衛生、教育、以至於研究都搞好，這就是與科學有關的政治；掌握這些政治的權，就是政權。

作爲自然科學工作者，即使不關心消極的統治工作，或是消極的政治（如法院、警察、軍隊等），我們至少應該關心積極的交通、工業、農業、醫藥衛生、教育、研究等事業，以至於利用科學改造沙漠河道等偉大的計劃。如果我們關心這些積極工作，你不參加進去，那末誰去工作呢？難道我們袖手旁觀看着非自然科學者去担起這些自然科學建設事業的工作麼？

一　「他們政府」．「我們科學工作者」

有人說，不錯，我們自然科學工作者非常關心交通、工業、農業、醫藥衛生、教育、研究等事業，但是這些是「他們政府」之事，「我們科學工作者」祇知道服從命令。我們可以提供意見。如果「他們」採納了「我們」的意見，那「我們」就好好地幹；如果不能採納我們的意見，那麼我們就「窮」則獨善其身」，還是退而關起門來研究我們學問罷！我說，這個態度是錯誤的。

怎麼說是錯誤的呢？

主要錯誤點，就在乎認「政府」爲「他們」。政府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就具體的中央人民政府來說罷。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呢？是由政府委員會組織起來的。政府委員會的七位主席五十六位委員是怎樣產生的呢？是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選舉出來的。在六百六十二位人民政協代表裏面，專門有一個單位是自然科學工作者；自然科學工作者有十五位正式代表參加人民政協；所以亦行使了選舉權。如果說這十五位代表代表了我們自然科學工作界的意見；那末，這十五位代表亦就代表了我們整個自然科學工作界執行了選舉政府委員的權，這十五位正式代表（和其他五百多位各黨派各團體的正式代表）共同選出的政府委員，亦就是我們大家選舉出來的政府委員。

因爲這些政府委員是有我們參加在內的代表們共同選舉出來的，所以他們所組織的政府，是我們的政府而不是「他們」的政府。亦因此之故，政府和我們是一體而無客主或統治者被統治者之分的。亦因此之故，現在的政府稱爲「人民政府」，這就是說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亦是我們自己的政府，祇要你是「人民」。

在這裏，大家會提起兩點疑問。第一點是這十五位自然科學工作者的代表，連同其他五百多位代表，都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統戰部領導之下產生的，並不是我們全國人民自動組織起來以後選舉出來的。第二點是我們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工作者（除了參加七月間科代籌備大會的三百餘位之外），並沒有拿到選舉票，亦沒有選舉什麼人。對於這兩點，還需要解釋。

關於第一點，我們說人民政協五百多位正式代表，是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領導之下產生的，這是對的；其原因就是人民政協根本就是中共中央號召以後經過各方面的響應才召開的。但是我們要了解中共究竟祇是號召領導，并沒有一手包辦；領導與包辦有絕大的區別。中共號召召開人民政協，是由於革命形勢的展開及其必要。在五百多位政協代表之中，眞正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不過十五位，其他的代表都是由各單位自已產生的，因此人民政協是「人民」政協而不是「中共」政協。如果祇是根據於共產主義的政黨（而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產生政府的方式，如果不照顧中國本國的環境，很可能如蘇聯那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而不是人民（四個階級）專政的政府。現在的政府却是四個階級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且無產階級祇是領導而不是專政，亦沒有放棄領導的責任，這完全是革命客觀形勢的需要，亦是現階段中國的需要，亦是現階段中國人民的需要。假如關於這一點都不贊成，那就祇有向馬列主義或新民主主義去分辯，亦就是向社會科學去作思想鬥爭，這就牽涉得很遠，不在本文話內。反過來說，假如你信任了馬列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科學，你承認了無產階級的領導，那末就可以瞭解中共的領導的正確及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的功績，以及人民政協的召開是一個怎樣偉大的勝利成功。

關於第二點，說絕大多數自然科學工作者，並沒有寫選舉票，舉出這十五位政協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這是對的。最理想的辦法是每個科學工作者都有一張選舉票，都投一張選舉票，亦就是所謂「普選」，這是最民主最理想的。要實現這件事，就要好好地籌備，將每一個科學工作者登記起來，而後由登記的科學工作者來投選舉票。這就是現在「科代」正在進行的工作。但在今年（一九四九）八月間，政協需要科學工作者推出代表的時候，來不及這麼作，這他是事實。可是雖然來不及這麼作，究竟推選出來參加政協的代表們，比較地是有代表性的，這點是我們可以承認的。

經過我們這麼分析之後，現在問題又還到老地方來，就是科學工作者對於選舉代表，參加政府及政治性科學建設事業，究竟是否大家有了共同的積極的熱忱了呢？如果任何一位科學工作者，根本沒有這種熱忱，那末他還不會提出上面所說的兩點疑問；假如他是有熱忱的，則他提出這些疑問，經過上面解釋之後，他的疑問是應當渙然冰釋了。

現在我們仍然回到老問題來，就是科學工作者的政治熱忱問題。

二　政治與科學眞理

關於政治熱忱這一點，在自然科學界裏有一種很普遍的論調，就是說科學工作（特別是研究工作）是求眞理；求眞理之事，最好不要受政治影響，因此科學研究工作者不宜過問政治而宜脫離政治，躲避政治。殊不知科學工作想要超脫政治，而事實上却逃不脫政治的掌心。

我們說科學工作逃不脫政治，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科學工作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工作。

科學工作者本身工作得很好，可是經過第一次第二次帝國主義及法西斯戰爭之後，多少科學工作者在咒詛戰爭罪犯，說是政治家愚弄了科學家，誤用了科學成就了。是的，科學是這些戰爭罪犯的工具，他們自己亦犯了戰爭的罪行；可是如果我們放大眼光來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之下，科學成就被人利用成爲帝國主義及法西斯的戰爭，及其他殘害人類的罪惡，這是不可能逃避的命運。

在資產階級專政之下，科學是自覺或不自覺或被欺騙地受了政治支配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政治是不是牽連到科學呢？當然亦是的。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的保衛祖國保衛民主運動就是顯明的例子。但是這種「牽連」，是救了人民而不是害了人民。

或者我們再舉一個例子罷，譬如說去年蘇聯發生的李森科——米邱林生物學路綫。去年李森科和蘇聯國內，莫爾根形式遺傳學派論爭結束之後，政府議決

擁護李森科的路線，壓制莫爾根的路線。政府和黨是要這麼作。爲什麼呢？當眞理已屬於李森科的時候，人民已經決定要李森科路線的科學不要莫爾根路線的形式遺傳學了，所以他們作出這麼決議案。這是人民的需要，亦是正確的科學路線的需要。這是用政治力量，幫助了正確的科學路線。政府和黨爲什麼不這樣作呢？

如果科學工作者說是研究莫爾根形式遺傳學，這是科學自由，政治不應當干涉這種自由；但是當科學界已經辨明形式遺傳學是反動的時候，這個時候人民不允許有反動的自由，這就是人民專政；這是有利於人民，亦是有利於科學。譬如以前希脫勒的反動人類學家說黃種中國人是生而劣種，生而被統治的人種（現在美國還有這些反動者），現在如果國內有這種人類學研究，我們的人民政府不取締麼？相反地，假如我們中國人類學家有批駁希脫勒偽人類學家的科學路線的，我們人民政府予以獎勵，這不是應當的麼？（我舉出人類學這麼一個例子，是因爲國內目前對於李森科的正確性及形式遺傳學的反動性，還不會被普遍瞭解之故。）

談到自然科學裏面有反動政治性，在國內亦許還太早，不很普遍；但是人民政治是有利於科學眞理，反動政治是有害於科學眞理，這一點是重要的。爲了這個緣故，亦就是說爲了科學眞理，我們從事於自然科學的工作者，不能不參加並擁護人民政治，脫離並反對反動政治。這不是爲了什麼，亦正是爲了眞理。

四　我們科學工作者不能放棄科學建設的意見與工作

有些人說，是的，我們承認在反動統治之下，科學求眞理的工作除了帮同反動之外，即將受到阻礙，猶如美國在杜魯門統治之下，原子核科學就失去了研究及發表論文的自由，從而阻礙原子核科學的發展，除非你帮同去製造殘害人類的原子武器。此外我們亦承認在人民統治之下，我們能夠並且需要發展科學研究及其他工作，使科學造福於人民。那末我們就要問：怎樣作？誰去作？

譬如人民政協議決的「共同綱領」第五章第四十三條第一句就說努力發展自然科學。這意見是對的麼？對的！怎樣作？這就需要科學工作者大家提供意見，方案與計劃。誰去作？這就需要科學工作者去作。

我再舉幾個具體例子。「共同綱領」第五章第四十三條下面有一句話，說是「獎勵科學發現和發明」，這是經過修改而來的；當初原是「獎勵科學發明」。有些科學工作者代表們，看見獎勵科學祇有發明而沒有發現，這是不對的，於是提出「發現和發明」，這就合乎科學工作的事實了。但是如果沒有科學工作者代表們參加意見，亦許結果祇獎勵科學發明而不獎勵科學發現了。又如興修水利工作，當初祇提到農業水利及交通的水道，科學工作者又提出興修水利是爲了農業的灌溉和防洪防旱（三十三條），工業的動力（三十四條），及交通的水運（三十五條），結果亦這麼列上去了。就這些例子看起來，我們科學工作者不提供意見，還有誰更適宜於提供意見呢？

現在「共同綱領」是制定出來了，中央人民政府亦組織成立並開始工作了，「共同綱領」裏所規定的農林、漁牧，工業、交通、醫藥衛生、以及科學教育和科學研究等，是人民所需要的，是必然要做成功的。這許多工作，都是政治工作，都是政治事業，我們對於這些工作，對於這些事業，有沒有熱忱呢？如果沒有熱忱，除非你脫離了科學工作崗位；如果你有一番熱忱，這亦就是你有了政治熱忱。現在的政治，是人民統治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亦就是人民的事業；不是以前統治人民政治時代，所謂政治是去作統治人民的事，去作大官，去昇官發財，現在你對於這些事業所發生的熱忱，亦就是對於政治所發生的熱忱。

五　爲了熱忱，要開代表大會，要把代表大會開得好

你有熱忱，你就有意見。個人意見由於你的專門性，是非常重要的；但亦許有偏向，亦許有不週。譬如草擬三年計劃或五年計劃，欲求縝密週詳，則個人意見不如集體意見，集體意見不如全體意見。因此希望每位科學工作者都提出意見，全體會同商議，得出一個共同意見；而後照着共同意見，去共同實行。這不是最民主最科學的辦法麼？

如果你承認這種民主的、科學的辦法是對的，那末我們不要關在家裏一個人作計劃，並且計劃作好了之後，硬要政府照我個人的意見[illegible]去執行。相反地，我們要儘量提出計劃和意見，但是去會同大家的計劃意見，共同商決，再是請政府採納施行。

如果每個人的意見都像我的意見一樣珍貴，那麼是不是要全體科學工作者（五萬人十萬人以至於五十萬人）在一個會場裏討論呢？這是不可能的。這麼作既是不可能的，那末我們全國科學工作者怎麼辦呢？我們就要推選若干代表，或是別人代表我的意見，或是我代表別人意見。如果一個人代表一千個人的意見，那末五萬個科學工作者就有五十個代表，五十萬人就有五百個代表。五百個代表，就可以集合在一起開會了。

像這樣一個代表大會，豈不是民主的、科學的、有效的、並且需要的麼？經過這麼一個代表大會的議決案，就交給政府去作麼？是的，這些決議案是科學界全體的意見，是非常珍貴的，我們希望政府採納施行。可是，我們同時也要顧到政府事業的其他方面。政府事業有軍事、有外交、有內務、有財政、有教育、有文化、有法院，有……。祇就是教育文化方面而言，還有文藝工作、社會科學工作、新聞工作等，關於這些自然科學範圍以外者，又有他們代表們的綜合意見，我們爲了配合其他方面建設事業的意見，共同配合起來，這才是健全的穩妥的建設計劃，例如我們要建設TVA，就不能不照顧到財力人力和動力的消耗量；我們要在上海建設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就不能不照顧到軍事上的安全，諸如此類。因此我們代表大會的議決，再交給中央政府去作總的配合，總的計劃；再由中央政府頒佈工作計劃，這又是很聰明的，是合理而科學的科學事業之政治性。

我們科學工作者最客觀最照顧全面亦就是最科學。我們自己的科學計劃不願妨害其他部門的計劃，當然亦不願意其他部門的計劃妨害我們科學計劃。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將願意服從將來中央政府所頒佈的科學工作計劃，我們尤其要求中央政府在頒佈總計劃之前，要注意我們科學工作者的工作計劃意見。

我們對於科學工作具有無上的熱忱，亦就是對於科學工作的政治配合具有無上的熱忱。由於這個熱忱，我們要登記起來，選舉代表，舉行代表大會，把代表大會開好。

這就是「科代」的工作！

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

儲安平

本文爲記者所著「東北參觀報告」一書哈爾濱一章中的第二篇。參觀時間是今年五月，記述時間是今年八月。

1.哈爾濱人民法院的工作

我們沒有去東北以前，早就聽到朋友傳述關于東北老區中司法的改革的情形。傳說的人都盛稱那種以人民利益爲本位的司法精神，以及以「司法的最高任務在改造」爲出發點的監獄工作，所以我們到達哈爾濱後，瞭解哈市的司法工作及監獄情況，便成爲我們參觀日程中一個很突出的課目。

司法是國家制度中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他們的學者雖然極力辯護，說司法並非單爲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設，而是爲了保障全體公民的公平的法權，但事實上，在那些國家中，法律祇是保障既得利益階級、剝削勞動大衆的工具，而司法就是現實這樣一種性質的法律的制度。中國俗語有云：「法院大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十四個字說得透澈之至，錢就是「理」，祇有有錢的人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沒有錢的人就變成法律欺侮的對象。再進一步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祇有有錢的人才能得到知識，才能利用他的知識去保障他自己的權利，反抗他人的壓迫，沒有錢的人就沒有得到知識的機會，就要受人的剝削，就要終身爲資本家流血流汗，犧牲至死。舊的社會制度既然是剝削勞動大衆的，舊的社會制度中的一部分——司法制度，也必然是保障有錢的資本家，剝削沒有錢的勞動大衆的。革命的目的在推翻這種剝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制度，司法制度也勢將有個澈底的改革，以符合保障人民利益的目的。

新中國的新的司法制度，目前尚在創造之中，所以我們能對老解放區中的司法工作及監獄工作的狀況，先有一個參觀瞭解的機會，是極有意義的事情。

× × × ×

哈爾濱市人民法院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成立的，他的任務在維護革命法紀、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及國家利益。哈爾濱過去本來是一個在國際上有名的複雜的壞碼頭，各種不良份子都集聚在這個城市裏，各種犯罪的行爲，都發生在這個城市裏。但自從中共進入哈市以後，總的來說，社會秩序有很大的改進。自從哈市人民法院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後，到一九四九年三月爲止，共審判刑事案件四千八百九十六件，民事案件三千九百件，非訟案件三千五百零一件，三項共計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七件。其中的民事案件雖然數字上升，但犯罪案件則逐年減少。一九四八年度的刑事案件是一千八百二十七件，比一九四七年度的二千零五十五件減少了二百二十八件，亦即下降了百分之十一強。在監獄收押犯人人數上，一九四八年度共收二千六百八十八人，比一九四七年度的三千五百八十一名減少了八百九十三名，亦即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以哈市人口與收監犯人的比例來說，一九四七年度的收監犯人僅佔哈市人口的〇・四四%，一九四八年度則下降爲〇・三三%。

我們現在分五點來敘述哈市人民法院兩年半以來的工作情況：

一、法律問題。一般人不明實情，以爲解放區沒有法律，或者不講法律，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在解放區是講法律的，而且是很尊重法律的。在解放區中，一般人對於法律的看法是：法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不可侵犯，所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當然也不可侵犯。

不過由于解放戰爭尚未結束，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還在研究設計之中，所以統一的法律尚未訂出，新的司法制度確立有待，在一切都在摸索與過渡的階段之中，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一部分人不根據具體情況，僅僅籠統的按照過去的形式來測量今日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以爲解放區沒有法律，這是錯誤的。哈市人民法院的王懷安院長說，他們審判案件，大都是有法規作根據的。總的來說，東北施政綱領是今天東北解放區的根本法。個別的來說，關于財產人權，有人權保障法爲根據；土地問題，根據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綱和東北行政委員會的補充辦法；債務則根據東北行政委員會處理債務的條文……當然，這些法規條文，都是單行的，今天還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全盤的法律，但是全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目前這個過渡時期即成過去，自然會有一套系統的法律產生。

有明文規定的單行法規，即照單行法規審案，沒有法規根據的，就根據政策審案。判決的輕重，要看：（一）所犯的罪行違反人民的利益到什麼程度；（二）犯罪行爲的性質，如所採的犯罪手段、犯罪的動機等，惡到什麼程度；（三）犯人對于自己所犯過失的態度如何等，來分別處理。同時，即使有條文根據者，審判時，亦應入情入理，耐心說服，不應官僚主義地完全死背法律條文。

二、審判制度。仍舊是三級三審制，即縣市法院、省法院，東北人民法院，一案三級。關于律師

，在原則上，仍舊承認律師制度，但是暫時不准律師出庭。舊社會中的事實說明法律上雖然規定人人均可聘請律師爲其辯護，但由於律師業務是私人經營的，取費甚昂，所以祇有有錢的人才能請得起律師，沒有錢的人就沒有力量去聘律師爲其辯護。而且在過去，由於律師品質的不齊，有的律師名爲法律的保障者，實際上成爲法律的破壞者，從中製造糾紛，剝削當事人，對于社會破壞多而貢獻少。東北當局，在這個過渡時期，決定暫時不准律師出庭，俾使司法工作更能接近群衆。爲了便利當事人訴訟起見，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東北行政委員會指示各地法院可採以下辦法，即（一）設立繕狀處，免費或低價代人民繕寫訴狀；（二）准許人民以言詞控訴，由法律人員加以筆錄，不必拘泥狀紙形式；（三）監獄設繕狀員，專爲監犯免費寫訴狀。這些辦法都是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羣衆，使人民處處便利。

關於人民陪審制度，現在還沒有能夠推行。按照蘇聯的辦法，蘇聯憲法一〇三條規定：「各級法院之審理案件，除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由人民陪審員參加舉行之」。按照一九三八年蘇聯法院的組織法，凡享有選舉權的國民，皆得爲人民陪審員，而且這種人民陪審員的選舉，是採取全民普選制的，即由各區公民按選舉區選舉的，也並無財產、身份、教育等等限制。而且其他各國採用陪審制，通常僅限於刑事一部份，其權限亦有一定，不參與案件的審問，在蘇聯，人民陪審員，民刑事均可參加，並在執行職務時，享受法官的各種權力，即對於庭審的延期與否、證人應出席與否、犯罪者應速捕與否、以及證人與犯罪者的審問，人民陪審員都有發言的權力。這種人民陪審制度，使人民直接參加司法工作，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人民，將來中國可能也要採行。但由於實際條件的限制，在東北老區中，還未能試驗推行。

三、案件情況。兩年多來，哈市人民法院處理的民事案件，以婚姻案件佔最多數。婚姻案件的內容，包括離婚、解除婚約、及姘居案件，而姘居案件在婚姻案件中又佔到百分之五十左右，這是哈市特有的現象，因爲哈市姘居情形比較普遍，假如姘居幾年後不願再姘，那就要要求分散。婚姻問題中包括着虐待重婚等等問題，所以婚姻案件的增加，也可以反映女性羣衆的覺悟，要求從舊的封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民事案件的第二位則爲房屋案件，包括租權上的糾紛等等。此外則爲商業性案件及一般財產糾紛。

刑事案件中最多的是偷竊案件，這類案件在刑事案件中佔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哈市有一種慣竊，他們有句俗話：「娼妓是他的媽，監獄是他的家。」這種慣竊，毫無生產技能，祇有偷竊技巧，生活墮落，意識無賴。最初人民法院採取寬大政策，加以說服，稍押即釋。但他們出獄後，還是繼續偷竊，老百姓提抗議，說捉了又放，放了又偷，還是沒有解決問題。所以現在對於這些人，刑期較長，可能長到二年三年之久，並重視改造，進行教育，教他生產技能，改變他的勞動態度。這些慣竊都是有組織的，一人入獄，其他同黨即担任輸送，常常送好的東西給他吃，所以雖在獄中，生活仍很舒適，現在已禁止送東西給慣竊吃，並要求他們長期勞動，希望在勞動中使他們改造成爲新人。

哈市人民法院成立以來，以處理案件的總數來說，可說是一年比一年多，但其中主要增加的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則顯示下降的趨向。刑事案件的數字下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爲表示社會的治安在進步之中。民事案件的增加，要分兩層來分析。第一先分析民事原告的階級，以一九四九年前三個月哈市人民法院所處理的一千零四十件民事案件爲例，在這一千零四十名民事當事人中，工人二百三十四人，佔百分之二二·五，城市貧民二百六十九人，佔百分之二五·九，獨立勞動者一百三十二人，佔百分之一二·六，三者合計佔當事人的百分之六十一左右。這些勞動大衆，在舊社會中，是被剝削的、被壓迫的，現在社會翻了身，這些一向被人踩在腳下的人，也抬起頭來，不願再受人家的欺侮、壓迫、剝削，所以大部分的民事案件都是由他們原告的，這是社會翻身過程中必然的現象。第二個原因是訴訟的程序非常簡單，不用狀子，不收訟費。在審判的過程中，法官也沒有什麼架子，沒有什麼形式，以親切談話的方式來調解民間的糾紛，人民因爲「打官司」太容易太方便了，以致過去許多不必要打的「官司」，如夫婦之間的一時口角等，現在也牽到法院裏來，以致使民事案件的數量爲之增加。

現在結案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一般說來，根據過去的經驗，案件在一週內結案者，佔到百分之四十六，二週內結案者，佔百分之三十，案件中的百分之九十都可以在一個月內結案。過去那種打官司要打上十年八年，甚至子承其父地打下去的情形，現在是沒有了，這也是新社會中新司法的特色。

四、外僑案件。哈爾濱八十萬人口中，外僑有三萬，國籍有二十幾國，其中以蘇聯波蘭二國僑民最多，這兩國的僑民佔到外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

外僑人數在哈爾濱總人口中，雖然祇佔到百分之四弱，但在司法案件中，外僑案件卻要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外僑案件中，根據一九四八年度的統計：

原告華人	被告外人	佔	一八·一%
原告外人	被告華人	佔	三七·五%
原告外人	被告外人	佔	四一·五%

對於外僑民訴訟案件，是根據主權獨立、民族平等、及勞動人民間的國際主義精神來處理的。凡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者，統予保護，違反法令者，統予制裁。審判外僑時，法官用中文，外僑可用該國語言，另再翻譯。在一九四八年度外僑民事案件二百五十三件中，當事人有蘇聯、朝鮮、波蘭、匈牙利、日本、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臘九個國籍，再算上非訟案件，則還要加上南斯拉夫、葡萄牙、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一共十五個國籍。在一九四八年度審理的刑事案件一百二十七件中，因違反我人民政府法令而被判徒刑者，有一百七十二名，其中六名被處極刑。外僑在中國的法院的判決下，被處死刑，在中國的司法歷史上是新的紀

錄。

五、監獄問題。新社會中的監獄作風和舊社會中的監獄作風在基本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爲新舊政權的性質在基本上就彼此不同。在舊社會中，監獄的作風是恐怖與黑暗，在監獄中嚴刑拷打，有時肚子也吃不飽，衛生方面則又髒又臭，不通空氣，整個的環境使人恐怖畏懼，利用恐怖來使人不敢犯法，這種情形完全是消極的。新社會中的整個司法的精神是教育和改造，在監獄中，給犯人以「人」的待遇，顧到他們的飽暖，顧到他們的衛生，告訴他們犯罪的原因，提出新的人生態度，要他們改造，要他們重新做人，變成社會上積極有用的人，教他們生產的技能，要他們從事勞動，並提高文化的學習，積極實行了「通過勞動改造犯人」、「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結合」的方針。執行這樣一個監獄工作，最初是會遇到許多困難的。首先要使在監獄中工作的幹部，面向犯人，要愛護犯人，照顧犯人，教育犯人，把犯人當做「人」來看待。八一五後修理監獄時，他們先修監房，辦公室和職員宿舍則放在最後修。去年有一次扭秧歌時，也扭給犯人看。最初有的幹部不願意，說平時審問犯人，現在在犯人面前扭秧歌，下次再審問他們時，豈不是沒有「尊嚴」了嗎？但是爲了要貫澈幹部面向犯人的作風，所以決定試一試，結果犯人大樂，犯人看到推事也居然來扭秧歌給他們看，犯人覺得人民法院看重他們，提高了他們的自尊心。關於生活上一些問題，如大小便、滅蝨子等，均由監獄幹部和犯人在一起討論，共同努力，力求改善。大概犯人初入監獄，一天到晚就祇想出來，可是經過半年的教育，勞動成了習慣，都願在獄中學得一技之長，以便期滿出獄後可以自力謀生。犯人中有各種生活小組與生產小組，力謀自給自足，藉以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担。犯人經過教育後，都能自發工作，並努力立功。獄中的外僑犯人，在生活上、勞動上，都和中國犯人同樣待遇，同樣管理，外僑犯人中也有立功的。至於在監獄中組織生產，應該實行「組織在監生產與社會就業相結合」的原則，換句話說，教犯人生產技能，並不應從監獄本身的條件或利益爲出發點，應顧到犯人出獄後就業的難易，以及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需要。舉例來說，爲了適應北滿條件，最近哈爾濱監獄中除了已有的許多工場以外，又增設了馬尾工場，一方面使學會了這項技能的犯人，出監以後，就可以立刻得到職業，另一方面社會上也確實需要這種技術工人。

2. 哈爾濱監獄參觀記

哈爾濱監獄可實在不像一所「監獄」。當我們剛剛進門的時候，這就像一所住宅，或者說，一家「公館」，門口及週圍氣象，沒有一點「監獄」的味兒。最出乎意外的是：我們進去後先在他們的會議室休息，這間大會議室，四壁和天花板都油漆一新（是紫羅蘭色的圖案），天花板上垂下的電燈罩也是富麗堂皇，比普通機關裏的會客室或議事室漂亮得多，而這樣一間漂亮的會議室，就是監獄中的犯人合作修起來的。

在監獄的內部，也不像監獄，而是像一所學校，或者充其量像一家工廠，除了部分犯人，如特務、重犯、未決犯等，還像是在「監獄」中的樣兒，固定地被看守在監房中以外，其餘絕大部份的犯人，都在各工場做工，是很自由的。監房共分老監房、已判監房、未判監房、病監、女監五種。一般說來，監房裏的光線和空氣，都是足够的，祇有一兩間監房裏面的犯人比較擁擠一點，這多少是受了房屋限制的影響。一律是雙層大舖，被褥整齊。我們去參觀時，被看守在監房裏的犯人，有的在讀書（課本是「犯人初級讀本」），有的在記筆記，有的在下象棋，在一個走廊的角落裏，還有兩個犯人在那兒編劇本。有一個未判監房中，有一個犯人正在讀報給其他犯人聽，大家面上都顯出津津有味的樣子。有犯人俱樂部，下分四系一室，即福利系、衛生系、教育系、文娛系、及資料室。犯人有犯人的壁報，我們看到犯人寫的字，畫的畫，都不差。另外有一大間閱書室，有書一千五百册左右，犯人可以借到監房裏去閱讀，圖書室的管理員也是由犯人中推選出來自動担任的。每天午後一時至二時半，是學習時間，學習的內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學習、文化學習、業務學習，晚上或者討論，或者娛樂。女監也非常乾淨，女犯大都坐在舖上做縫紉工作，其中還有幾個蘇聯女犯；女犯案件中最多的是通奸，其次是偷竊。生了病的犯人另外有病監，使病犯和普通犯人隔離，以便治療。

哈爾濱監獄的主要特點，除了我們上面所提到過的「通過勞動改造犯人」，「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結合」之外，最使人欽佩的，就是監獄能自行組織，從事生產，在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不再需要增加國庫的負担。哈爾濱監獄中的生產組織，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值得廣爲宣揚的經驗，可供全國各地的監獄引爲模範。一九四七年春天以後，東北當局決定監獄要搞生產，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這樣，可以使國家對于每個監獄祇要負担最初一個時期的經費，不致長期支付，藉以減輕人民的負担。哈爾濱監獄于一九四七年七月，領得生產基金五百萬（東北券，在我們參觀東北時，折合人民券約爲一萬六千六百餘元），就以這個五百萬元起家，搞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已能達到經常一千個犯人的經費自給。這五百萬在當時祇能用來購買一些簡單的工具如斧、鋤等，當時就由犯人出外去做零工，在勞動所得中，慢慢兒的把生產資本累積起來，才能慢慢兒在監獄內建立工場。工場中的機器則由政府撥給。現在監獄內已有豬鬃、被服、印刷、織布、鐵工、木工等六個工場。織布工場中就有三十架織布機，織白布及毛巾等物，我們是五月九日去參觀的，看到牆上所張貼的前一天（五月八日）的生產紀錄，是五四式布六十五疋，毛巾四十打。在印刷工場中，排字部、印刷部、裝訂部、繪版部、製版部，設備粗具，印刷機有七架，切紙機有二架。在被服工場中，縫紉機多到五十餘架，做軍服及子彈袋等。不僅工作的人是犯人，就是管理及記賬的人也都是犯人。犯人一般工作時期是每日八小時，另加學習二小時。但與軍需有關者，可能每日工作十小時，在這種生產努力中，到一九四七年冬天，在監獄經費上，辦

公費及犯人菜金卽能達到自給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十月，就達到了經常一千犯人的經費自給，包括着一千犯人的囚糧、菜金、囚衣、取暖、醫藥、辦公、修葺各費在內。一九四九年起，除了上述各費的全部自給外，還有盈餘。根據一九四九年四月的統計，生產的收入共達4,054,608分。每「分」按照當時哈爾濱的物價，約值東北劵八千元左右，這就是說，哈爾濱監獄一九四九年四月的生產收入，當在東北劵三百億元以上（這是一個不精確的約數，目的在使讀者有一個概念）。在這個收入裏，分配開支如左：

犯人經費自給	二五%
再生產投資	四〇%
房屋修葺費	二六%
現金週轉金	九%

監獄生產在性質上是一種國庫收入，所以在法院及監獄中的工作幹部，他們是國家的公務員，他們的薪金費用由政府負担，並不在犯人生產收入中支付。監獄生產收入僅限於上列三種用途，卽經費自給、擴大生產、及修理監獄，這三種用途以外，再有多餘，卽歸國庫。監獄的會計是獨立的，除了政府指派的會計外，日常賬目都是發動由犯人自己來管理的。犯人因爲知道沒有人在剝削他們的勞動生產，所以生產情緒都普遍提高。

在監獄中，勞動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教育，但各工場的生產都有一定的標準，超過了標準的，可以得到獎勵金。犯人工作好不好，以下列四點爲標準，卽數量質料、節省原料、互助精神及學習成績。好不好先由犯人開會公評，最後由監獄決定。去年有一個犯人，他的母親去看他時，千方百計湊一點欵子，想帶給她在獄中的兒子零化，因爲在舊社會中，犯人沒有錢便要在獄中吃苦頭的，不料那個犯人非但不要他母親帶來的錢，並且因爲獄中剛剛發了他七千元的獎勵金，反而分給他母親四千元。他母親眞是連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事，回去後就到處說，現在的人民政府眞好，犯人進了監獄，不僅不吃苦頭，還會掙錢，她眞是喜出望外，高興到了極點。犯人得到獎勵後，最初大都用來買零吃的東西化了，最近在監獄的教育下，都改變了，都用來作購買書籍文具了。

犯人的勞動收入雖然很多，但犯人的生活標準，不能超過普通的老百姓，假如超過了老百姓的生活標準，則老百姓就要說話，說他們犯了法，可是生活倒反而比老百姓好了。這樣就要犯脫離羣衆路線的錯誤。不過由于監獄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犯人都生活在有組織的情况之下，所以衛生水準要比外面一般老百姓爲高。在僞滿時，犯人的死亡率高到百分之十五，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百分比。由於人民政府重視人民的生命，改善衛生環境，哈爾濱監獄一九四七年的犯人死亡率爲百分之一．八，一九四八年則更降爲百分〇．八了。

犯人期滿出獄時，除「出獄證明書」外，還有一個由獄中發給的「鑑定書」，說明他在獄中的各種情形。他出去報新戶口時，鄰居都會要求看這些文件的。

在東北解放區中，不能以金錢來代替刑罰，所以在監獄中，還沒有罰欵代刑的事情，但是假如犯人的在獄已超過原判的三分之二，他的坦白態度和工作態度都特別好者，也可以酌量予以減刑。

一九四九年八月記於北京

一九四八年度蘇聯經濟建設成績的報告

蘇聯國務院中央統計局

本文是蘇聯國務院中央統計局所發表的、關于完成一九四八年度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國家計劃的說明。這篇報告說明了蘇聯一九四八年的經濟建設，無論是在工業部門、農業部門、運輸部門、商業部門等各方面，實際完成的成績都超過了原定的國家計劃。由于經濟建設的燦爛發展，也就同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的購買力，提高了各種文化建設和文化水平。這是一篇完整的報告，本刊特別譯出，以供讀者參考研究。

觀察編輯部譯

一九四八年工業、農業和運輸的發展，資本建設的發展，貿易的發展，人民生活底物質與文化水平的增進，可用下列的資料來表明：

一、工業生產計劃的完成

一九四八年總生產量的生產計劃已由下列各部完成：

部	一九四八年度國家計劃已完成的百分率
冶金工業	一一一
煤炭工業	一〇一
石油工業	一〇八
電站	一〇三
化學工業	一一六
電氣工業	一一五
交通器材工業	一〇六
重工業	一〇七
汽車及拖拉機工業	一一五
機器工業	一〇八
機器及工具創造工業	一〇九
建築及築路機械工業	一二六
運輸機械工業	一二三

農業機械工業	一〇五
蘇聯建築材料工業	一一二
蘇聯木材及紙張製造業	一一一
蘇聯輕工業	一〇六
蘇聯水產工業	一〇〇
蘇聯肉乳工業	一〇〇
蘇聯食品工業	一〇八
蘇聯調味品工業	一〇四
各盟員共和國的地方工業及地方燃料工業	一〇五
工業合作社	一〇一

就蘇聯整個工業來說，達到了一九四八年總計劃產量的百分之一〇六。就整個五年計劃的工業計劃產量來說，在一九四六——一九四八當中，已完成了前三年的百分之一〇三。

在一九四八年內，不少工業品的產量超過了計劃，譬如鐵金屬和非鐵金屬、煤炭、汽油、電力、狄塞爾引擎、油力發動機、電動機、球軸承、金屬切割機、礦物裝載機、旋鑿、抽水機、壓縮機、火車頭、客車、電鋸、木材構造物、無軌電車、公共汽車、挖掘機、動力輾、水泥調配器、若干農業機械、電話機、無線電發報機、自動織襪機、苛性鹼及燒鹼、無機肥料、顏料及其他化學品、橡皮、汽車胎、紙張、三合板、火柴、石板瓦、窗玻璃、屋頂材料、棉花、羊毛、蔴及絲織物、植物油及牛油、酒精以及許多其他工業品。

在過去一年中，也有許多新式和高效率的機器、設計、工具和儀器，以及最新的技術和工業方法，爲蘇聯所成功地掌握與應用在蘇聯的國民經濟上面。

只是，雖然整個工業總產量的生產計劃和多數重要工業產品的生產計劃是超額完成了，有些部對於若干重要產品的計劃却沒有能够完成。金屬工業部沒有按照計劃完成這一年的鋼製電線產額；汽車及曳引機工業部，沒有完成汽車的計劃生產；重機械部，在蒸汽吞卒和冶金起重機上有些欠產；運輸工程部之于狄塞爾發動機；機器工業部之于幾種車床；機器及工具製造部之于化學設備和織機；農業機械工業部之于拖拉播種機和除草機；電氣工業部之于主要路線的電動火車頭和幾種電動發電機；蘇聯木材及紙張製造業部之于枕木，都沒有按照計劃完成。

二、工業產品的增加

最重要品類的工業品之生產，指示出一九四八年與一九四七年相形之下的變化：

工業品類	一九四八年的生產占一九四七年的生產之百分率
生鐵	一二二
鋼	一二八
輾平金屬	一二八
鐵軌	一三四
鐵管	一三九
銅	一二〇
鋅	一三六
鉛	一〇二
煤炭	一一四
油	一一三
汽油	一一二
煤油	一一七
天然氣	一一〇
電力	一一六
主要路線的火車頭	一五三
主要路線的貨車	一四五
無軌電車	一七四
車臺	一四三
汽車	二一〇
公共汽車	一四二
球軸承	一二八
冶金設備	一九四
挖掘機	二八四
蒸汽吞卒	一一七
一百瓩以下的電動機	一五九
一百瓩以上的電動機	一五三
金屬切割機	一二四
特殊及聯合金屬切割機	一四二
水力機	二〇五
織機	一七八
曳引機	二〇四
農業機械	一九九
收穀機	五•一倍
拖拉犂	二二四
拖拉播種機	二一一
拖拉除草機	一三一
複合打穀機	二六七
苛性鹼	一二五
燒鹼	一四四
無機肥料（過燐酸鹽、硝酸鹽及炭酸鉀）	一四三
綜合橡皮	一七九
綜合顏料	一三五
汽車胎	一三八
木材	一三三
紙張	一二〇
水泥	一二七
石板瓦	一三五
窗玻璃	一二〇
屋頂用氈	一一九
磚	一五六
棉織物	一二四
羊毛織物	一二八
皮鞋	一二三
膠皮鞋	一三七
長襪和短襪	一四四
肉	一二五
魚	一〇二
牛油	一三七
植物油	一三三
糖	一七〇
肥皂	一四五
酒精	一五〇

蘇聯整個工業的總生產量在一九四八年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並且超過戰前的一九四〇年百分之十八。

一九四八年底國家供應計劃是完成了，並且爲國民經濟保證了一個更好的、在原料、燃料、電力，和設備方面的供應。

在一九四八年許多工業完成並且超額地完成了對於設備、原料、燃料、和爲國家計劃所包含的材料底平均累進利用額。有些工業在一九四八年設備利用額超過了戰前一九四〇年的利用額。

在冶金工業部底企業中，鼓風爐的效率比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敞爐面積每方米的產鋼量比戰前數字增長了百分之十二，油工業的企業中，油井鑽掘機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建築材料工業部的水泥廠底效率也有增進。電站部在各地電站每生產一瓩小時電力的燃料消耗比一九四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五。

同時，有些工業部門沒有充分利用已有的設備能力。

煤炭工業沒有達到國家計劃所訂定的剎煤機利用額，油工業沒有達到該年度計劃所規定的預期鑽掘速度。紡織工業沒有完成關於主要設備之生產力的計劃。

在一九四八年一個新的、爲了動員內部資源、爲了企業之有利地運行 、以及爲了超計劃的累積的愛國運動普遍地發展開來。由於工業品的生產成本減少，一九四八年的超計劃的儲蓄數達六、○○○、○○○、○○○盧布以上。

三、農業的進步

由於寶現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二月全體會議底決定，在一九四八年，農業方面得到了新的、顯著的成就。雖然在伏爾加區域的大部分有着不利的天氣情況 ，蘇聯全部穀物收穫量超過七、○○○、○○○、○○○蒲特（一蒲特 Pood 等於三六·一一三磅），實際上達到了戰前一九四○年的水平，而每一公畝的平均的穀物收穫量則超過戰前的水平。（一公畝Hectare 等於二·四七一英畝。譯者按：一公畝等於十五華畝。公畝與俄畝畧有不同，一俄畝等於十八華畝或二·六英畝。）一九四八年季的播種面積的增加，達到一三、八○○、○○○公畝，和一九四七相比較，那時的穀物播種面積是一○、○○○、○○○公畝。

國家計劃中爲了一九四九年的收穫而規定的秋季播種額，也超過了。要由今年來收割的一九四八年冬季播種面積實際上比一九四七年多出三、○○○、○○○公畝。一九四八年的秋季犂耕面積比一九四七年增多一七、○○○、○○○公畝。

一九四八年機械拖拉站在集體農場的土地上所作的工作，比一九四七的數字大百分之二十三，每一部拖拉機的生產力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並且比一九四○年加多百分之十三。

一九四八年集體農場底社會化的家畜飼養之發展，是加速度的。家畜的數目相當地增多了，家畜飼養業的生產力也相當地上升。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集體農場的家畜數目，與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相比較，其增加的情形如下：有角家畜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猪增加百分之七十五，綿羊和山羊增加百分之十六，馬增加百分之十五。構成集體農場場員、工人、和僱員們底個人財產的家畜數目，也同樣增加。

爲準備在農業上採用禾草輪種制，並完成部長會議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命令，有大量必需的工作。爲了這些工作，蘇聯歐洲部分的草原及森林草原地帶的集體和國有農場與林場在一九四八年秋天作了不少的事情：種植森林保護帶，爲一九四九年種植森林保護帶預備土壤，收集各種樹木的種子和小樹，設立森林苗圃，並介紹禾草輪種制。

在一九四八年有一九九、○○○公畝的總面積變成了森林保護帶，二七○、○○○公畝的土壤準備好在一九四九年可以植樹；一、八六九、○○○、○○○株幼苗已在森林苗圃中生長，二、八○○個以上的池塘和貯水池也已由蘇聯歐洲部分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區的集體農場建造起來。

對於農業的燃料、無機肥料、機械的供應，也都大有增加。過去一年中，國家生產了比一九四○年多出三倍的拖拉機，兩倍的汽車和兩倍的農業機械來爲農業服務。

四、鐵路·汽車及水道運輸總額的增長

一九四八年的鐵路運輸總額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並且超過了一九四○年的戰前水平，一九四八年平均每日運輸量比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一九·三。

全國鐵路平均每日裝載的鐵和鋼，與一九四七年比較，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礦物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焦煤增加了百分之十七，油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煤炭增加了百分之七，穀物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麵粉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鹽增加了百分之十四，木材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水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四八年鐵路平均裝載量的總計劃是完成了百分之一○四。

雖然鐵路的工作在一九四八年是增進了，但是並沒有完全利用所有的鐵路底內部儲備力。一部運輸車在一九四八年的平均周轉時間，比較規定的時間爲長，主要是因爲在裝車和卸車時的躭擱過久。內地水道的貨物運輸量在一九四八年比一九四七年擴張了百分之二十九。一年河道運輸計劃經由內地水道系統超過了百分之六。在一九四八年航海商船比一九四七年多運輸了百分之十一的貨物；航海商船百分之百地完成了它們底一年運輸計劃。一九四八年的汽車運貨量比一九四七年的數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並且超過了一九四○年的戰前水平百分之五十。

五、國民經濟中資本建設的增長

就全部的資本建設數量來看，一九四八年是一九四七年數字底百分之一二三。在煤礦工業是百分之一二九，冶金工業是百分之一三一，電站是百分之一二○，機械製造業是百分之一一五，在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是百分之一三三，運輸是百分之一一一，在房屋建造是百分之一三六。

在一九四六——一九四八這段時期中，新建、修復且已經參加生產的國有工業企業，總達四千單位。一九四八年各委員部和各部門作了集中物質資源、金融資源、以及勞動力的工作。然而，有些建設工作並沒有按照國家計劃所規定的日期進行。在這戰後五年計劃的三年之中，國有企業、機關、和地方蘇維埃、以及人民自己在國家信用的幫助之下，在鎮市和工人居留區建造或修復了總數約爲五一、○○○、○○○方米，的住宅面積。（一方米等於一○·七六四方呎）

在鄉村地方，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建造和修復了一、六○○、○○○座以上的住宅。

六、貿易總額的發展

基於擴展蘇維埃貿易，在取消配給制度之後，一九四八年的國營及合作社的零售貿易，食品和製造品的銷售，增加很多，超過了一九四七。麵包銷售增加百分之五十六，食糖加倍，糖菓增加百分之四十五，棉織物增加百分之五十六，絲織物增加百分之二十九，鞋類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在一九四八年之中，貿易網是相當地擴張了。過去一年內國營及合作社貿易組織開設了三五、○○○家新的商店、貨攤、和棚販。農產品在集體農場的市場上售出的數量，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不少，並且遠超過戰前的水平，肉類、乳類產品和蔬菜的銷售，特別增加。

自從政府決定擴展鎮市和城市的合作社貿易以後的兩年中，合作社市場的價格落到了三分之一，而集體農場市場的價格在同一時期中落到四分之一以下。

七、盧布和眞實工資的購買力的增加

與一九四七年尾實行通貨改革和取消食品及製造品底配給制度同時，高昂的商品價格則被消除，食品和製造品的國營零售價格並且一致減低，由於蘇聯國民經濟的普遍提高，以及消費品產額的增多，一九四八年四月實施了若干貨品國營零售價格底第二階段的降低。並且，在一九四八年尾，若干貨品的價格再度減低。

由於食品和製造品國營零售價格的減低，和因而引起的合作社貿易與集體農場市場價格的低落，其結果是廣布底購買力倍增。隨之，並且也由於工資的增長，工人和僱員們底眞實工資在一九四八與一九四七的眞實工資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

八、手工業工人及職員人數的增加·勞工生產力的增長

一九四八年在蘇聯國民經濟中工作的工人和僱員的數目，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二、〇〇〇、〇〇〇人，這超過了一九四〇年的戰前水平百分之十。工業的大多數部門達成了一九四八年國家計劃所規定的增加勞工生產力的任務，工業中的工人勞動生產力比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並且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付給工人和僱員的工資總數在一九四八年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其中在工業部門中工作的工人工資總數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在建造業中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

一九四八年，在商業、鐵路、和工業職業學校畢業並安置在工業、建造和運輸業中的青年技術工人是一、〇〇〇、〇〇〇名。由個人和集體的學徒生活與訓練，二、三〇〇、〇〇〇名。新的技術工人接受了訓練，同時，並有高級的訓練授給三、八〇〇、〇〇〇名在生產中的工人。

九、文化建設·保健和鎮市改進

一九四八年度更以在文化建設上的發展和勞動人民底文化水平之提高爲其特色。初級和中級學校的註册人數的增加，超過一九四七年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在高級學校的學生總數是七三四、〇〇〇人——比一九四〇年的數字高百分之二十六。還有二七〇、〇〇〇人是利用函授，在高級學校裏讀書。在一九四八年，有一二二、〇〇〇名學生從高級學校畢業，這比戰前的一九四〇年的畢業人數多出二〇、〇〇〇人。技術及其他中級專門學校的學生人數達到了一、〇九四、〇〇〇人，超過一九四〇年的學生數目百分之三十三。在一九四八年有二五二、〇〇〇名學生畢業於技術及其他中級專門學校，比一九四〇年的畢業人數多四四、〇〇〇人。畢業於高級學校和技術學校並且參加國民經濟工作的專家總人數，在一九四八年比戰前的一九四〇年多出百分之五十五。

醫藥機關、療養院和休養所的分佈，在一九四八年中擴展了。醫院病床數目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二七、〇〇〇具，同時，療養院和休養所的供應設備增加了二八、〇〇〇處。一九四八年的醫生人數比一九四七的數目多二四、〇〇〇人。

在戰後五年計劃的三年之中，一五一處鎮市、城市、和工人居留地的主要水管，曾經加以修復或重建；十五座鎮市敷設了街車軌道；五座鎮市裏裝設了無軌電車；對一九五、〇〇〇所公寓供應了煤氣，並且在都市區域設置公園、林蔭路、花園和廣場的工作，也作得不少。

十、戰爭破壞區域的經濟善後事業

一九四八年中，在戰爭破壞區域的資本建設達到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數目，不集中的資本投資在外。戰爭破壞區域的工業總生產量在一九四八年比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其中生鐵增加百分之四十一，鋼增加百分之六十六，軋平金屬增加百分之六十五，電力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水泥增加百分之四十九，糖增加百分之七十五；而在頓巴斯（Donbas），煤礦增高至百分之二十一。

在一九四八年大約八、〇〇〇、〇〇〇方米的住宅面積在鎮市和城市中被建造或修復，並且有三〇〇、〇〇〇所以上的房屋在戰爭破壞區域的農村地方與建起來。

十一、各盟員共和國的工業生產之增加

下列資料可以表明各盟員共和國的工業總生產額，在一九四八年與一九四七年相形之下的變化：

盟員共和國	一九四八年生產量佔一九四七年生產量的百分率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二六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四三
別洛露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四四
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一三
卡查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一〇
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一六
阿捷爾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一三
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三四
莫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三八
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四一
基爾吉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一五
塔什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二〇
阿爾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二二
土爾克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九五
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三五
卡列里·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一四一

所有的盟員共和國的工業生產量在一九四八年都增加了，只有土爾克明共和國例外，這是由於它底在阿希卡貝德（Ashkhabad）的主要工業中心在一九四八年秋季遭受了一次地震的緣故。

在一九四八年——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底第三個和決定性的年度——蘇聯國民經濟的戰前發展水平都達到並且超過了。一九四七年尾實施的通貨改革和配給制之取消，創立了加速蘇聯整個國民經濟更加提高的有利條件。由於有力的、遍及全國的、爲了提早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競賽，一九四八年的國家計劃是成功地完成了，並且還創立了蘇聯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文化水平的必要條件。

啟事

讀者關于業務上的查詢或詢問，我們是素來答覆的，但是由于最近郵資的調整，以及信封信紙的成本都提高了，這筆郵函費，每月的負担很重。希望讀者能夠體諒我們的困難，減輕我們一點負担。以後凡是有關業務查詢的函件，如需要我們答覆的，請于惠函時，附寄一個貼足回件郵資、寫明收信人地址的信封。

讀者惠稿，如不採用，需要退還的，也同樣辦理。

定閱價目

三個月六期：六千元

半年十二期：一萬二千元

❶平寄免收郵費，掛號另加掛號費。❷東北區請參照山海關牌價折合，本社當照實際所收到的人民幣計算。❸定閱價目有調整時，以收到定費的日子本社所規定的價目爲準。

廣告價目（以折實單位計算）

地位	全頁	半頁	1—4頁	1—6頁
封底(套色)	400	200		
封面裏 封底裏	350	180	100	
普通	300	160	90	60

走向人民大學的里程碑——記清華大學的代表會議

觀察特約記者

清華大學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的，當本期本刊出版時，正巧滿一年。這一年來，我們的社會正經歷着偉大的歷史的變化，多少舊的、不合理的在死亡，多少新的、合理的在生長。在這個大時代的照耀下。清華大學的員工師生們，也對過去未來作了重新的檢討和估價。解放以來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正說明這個大學已從過去一個舊社會產物的基礎上，逐漸走向人民大學的道路上來。最近（十一月七日到十二月四日）清華大學所舉行的代表會議，便是走上這條道路的一塊堅強的里程碑。

一、從量變到質變

在解放的第一年裡，清華的校務，一般的說，是可以分做如下幾個階段的：（一）從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今年一月九日，這期間可以叫做無政府狀態時期，原校長已經離任，而我人民解放軍的神速進軍，又使文教方面的接管不能馬上隨着軍事的勝利而立即展開，此時期學校方面的任務似乎是在保管一切，聽候接管。（二）從一月十日的接管時期起到五月四日爲止，校務仍由原「校務會議」負責。（三）五月七日起，清華奉文管會命令組織新的校務委員會，其委員人選除教授、講助教之外還有同學的代表參加。在起初的五個月裏，校務會議的工作主要是偏重在行政方面。由於時代的影響，這些工作也逐漸改造了清華人的思想。如在教職員工評薪過程中，有關方面首先就揭露一個統計的數字，說明每個教授平均每年要一百四十四個中農來負担，每個助教要七十個中農來負担，每個同學要六十個中農來負担。

爲了對得起人民的小米，同學們在申請助學金時，不得不重新檢討：『農民們過着艱辛的生活，來支持我們讀書，我們能不好好的認眞學習嗎？』以前抽香煙的、吃零食的都受到了批評，農民的血汗是不能用在這些「不急之務」的上面的！這樣，從申請助學金的過程中，同學們的政治認識都普遍地提高了。

教師們看到中共幹部的艱苦作風，回顧自己相當舒適的生活，都感到人民對自己的期望太大了。好些一向埋首書齋的老教授們，也都紛紛的要求着學習，改造自己。清華大學的政治大課，絕大多數的教職員都是參加了的。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天，天安門前的行列，是師生並肩前進的。有人會問一位行走極不方便的教授：『爲什麼您這一次也能不顧疲勞參加遊行？』答覆是：『兩千年來人民的政權第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手裏，取消了封建的殘餘，打倒了帝國主義和買辦們的剝削，這難道不是値得慶幸與興奮的嗎？』

在這個政治覺悟之前，教師們是用了許多具體的事例來回答的。在節約救災運動中，大批的教職員都捐獻出了自己所能捐獻的小米。學校的甲級住宅不够分配，這在以往除了新添房屋之外是別無他法可循的，而今年，却在「爲人民節省小米」的口號之下，把一些較大的住宅如新林院等處，都由一家改爲兩家。這樣，甲級房屋的缺乏問題，可以說是完全得到解决了。這在沒有解放以前，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另外，學校的職員們雖在逐漸減少，而工作效率却並未受到影響。據負責人的報告，八月份職員的數目和五月份相較減少了33%，工警減少了30%。往年，冬季來臨，學校必須要請幾個月的短工來燒鍋爐同煤爐，而今年，在大批工友的自動熱忱之下，却額外的担任了這批工作，不必再去僱短工。每月的日常用煤，也節省了四萬五千斤。就這樣，學校是在一點一滴的變，教師們要求改造的熱忱加強，同學們學習的情緒提高，職工們逐漸的認識到自己的主人地位，在群衆普遍的反映之下，校委會在十月底把過去的工作作了一個總結。檢討了過去，也規劃了未來的發展。當這個總結送到全體清華人的面前時，各方面所反映的意見是那樣的熱烈，以致使校委會感到有立即召開一個代表會議之必要。

二、「從群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代表會議籌備會

爲了加强群衆的聯繫，校委會在十一月四日招待了各團體的負責人，交換意見的結果，大家都同意開一個代表會議。當場就產生了籌備委員會。緊接着在十一月七日就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各工作小組如總務組、宣傳組、提案審查組、代表產生組等。

代表產生以後，就向自己團體的群衆，徵詢對於今後校務的批評與建議，全清華人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提出原始的提案在七、八百件之間，經過了初步的整理，合併爲三百六十四件。在這些提案中間，「有二百十件是關於教學方面的，五十八件是關於行政方面的，八十二件是關於生活福利方面的。其他還有十四件是對校委會的意見。」從提案的踴躍來看，知道我們過去的制度的確存在着許多問題，問題是需要暴露的，即從這一點來看，代表會議是有着很大的意義的，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清華人又一次體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三、民主集中制——預備會議和小組協商會議

籌備工作告一段落後，便於十一月十八日開代表會議的預備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正式決定了主席團同秘書處的人選。更重要的是決定了各提案進行討論和審查的具體辦法。規定：『根據已由籌委會整理之提案分類經主席團討論籌署初步意見後交發各提案協商小組進行討論。』於是會議便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也即是進入到全體會議最重要的一環。起初，由「參加會議的各團體發動每個基層小組開始討論，並分別集中意見，歸納後向會議提案。」然後，代表會議即召集「原提案單位」對各提案進行討論，主席團並派人參加，以作爲未來簽署意見的根據。這就叫做「小組協商會議」。經過協商以後，原有的提案三百六十四件又歸納成綜合提案五十一件。

前面已經提過，這次提案的主要內容是集中在教學的改革上面，而教學改革的關鍵又在課程方面。一般說來，理工學院課程的改革問題是不大困難的，嚴重的是文法學院。所以提案的重點大都集中於文法學院的課程改革方面。下面的字句，在原始提案中是屢見不鮮的；如：「加强馬列主義的課程學習」，「有關院系應和經濟、文化等建設部門密切聯繫」、「貫澈精簡原則，減少不必要的課程與學分」、「加强教學領導」、「增加參觀實習」、「吸收工廠工作經驗」、「

儘量採用本國文學」、「溝通院系之間的聯繫」、「確立文法學院的教學方針」、「撤銷不必要的重複課程」。總結這些提案，大約不出下列四個範圍：

❶加強院系之間的聯繫，建立領導教學的機構。這是針對着過去校委會太偏「事務主義」而忽略了教學的改革這一點所提出的。

❷加強馬列主義的學習。這是因爲我們過去的大學是把這些拒於圍牆之外的。許多非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現在應該是我們澈底加以清算的時候了！

❸精簡不必要的課程。過去舊制中的學分制，不僅使學生透不過氣來，連教師們也覺得有點沉重。特別是解放以後許多教授先生們多用新的觀點來對課程加以改造，因爲時間倉促的緣故，都還不能建立一個深入的體系。於是文法兩院許多課程所講的「馬列」，開頭都是那一套。許多同學聽後都感到有點膩。同學們怕吃多了不能消化，教師們也需要一段時間來整理。

❹使理論與實踐結合，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據曾去東北參觀過的工學院同學說，他們在校所學的一套「機器」，在我們自己的社會裏，並不完全適合，於是要求「多與工廠聯繫」。又如文法學院的同學，過去所講的都是外國的理論，甚至於連舉例也是外國的，而我們歷史上人民大翻身運動的「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都還搞不大清楚，這些畢業的同學將來到社會上去時怎樣能「爲人民服務」？又如何能不發生一些職業的恐慌？

針對着這些問題，而提出了上述的提案；這實在也可以說是一個教育制度上的清算，代表會議可看作爲這個清算的一個鬥爭大會。

在一些有關教學的提案之外，還有很有意義的一項，就是第六類第一件：「請校務委員會設立一全校性的研究與編譯工作的領導機構案」。其辦法爲：❶確定以馬列主義爲一切研究工作之方針。❷研討大學中教學與研究工作應如何互相配合推換：由教學發見研究的問題，由研究充實與改正教學的內容。文法兩院之學系，對此尤有必要。❸統籌各院系之研究機構並充實其設備，務使各級教師於教學之外，人人得就其專門之學從事於研究。……❹同時，還須與「政府有關建設與生產之行政部門覓取密切聯繫，通過各院系之研究機構，協助其設計、調查、分析、及解決有關專門技術之各種問題，並與之作經驗與資料之經常交換，於必要時並得洽設各種專門之機構。」

關於編譯工作的決定是：「注意基本學程所需教本與參攷手冊之編譯，關於題材之選取與出版之便利，更須設法與政府出版機構及公私出版商覓取聯繫與合作。」

本來，大學教育的中心任務，一方面是在訓練人才（那是屬於教學方面的），另一方面則應注重於研究風氣之培養。在中國，由於某些學科還不够進步，故研究工作與編譯是分不開的。這個提案在小組協商會議中，已獲得協議，無須經過大會討論，後經主席團審查意見的結果，認爲可以送請「校委會辦理」。如果這個理想能見諸實現的話，對於我們新民主主義文教政策中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三大目標的達到是有着極大的幫助的，而對於我們上述大學教育中兩個任務的完成，也更是極有補益的。

爲了使這些寶貴的意見和提案能有充分的討論，這次會議的基本精神所採取的是「民主集中制」。即：用協商小組的方法，事先使有充分的討論，等到開大會時只要一讀一問即可通過。這樣的辦法，有些人先總不大相信它的「民主」成分，而在這次會議中，却得到了充分的體驗：它的確確是民主的。因爲假若把這些提案交到一個有二百五十六人的代表會議的大會上去討論，事先又沒有經過磋商 ，到時一定是亂轟轟的，屆時雖舉手「反對」或「贊成」，但却未必能攷慮周到。這不僅耽誤了大家的時間，而且一定會得不出好的結果。但這次會議的提案，在協商小組的協商過程中，却使每個人有充分攷慮的時間，有足够發言的機會，在某一個小組中遇到了一個大家意見極爲紛歧而相持不下時，主席就臨時宣佈休會，以便在個別交換意見之後，再來進行討論。有的一次討論不完時，下次再繼續討論，譬如在討論提案第一類有關於「成立教學委員會」的問題時，有的認爲「這個委員會應與校委會平行」，有的則主張應以校委會爲核心，吸收各院系參加。在第一次的討論，大家得不出結論，到第二次再討論時大家終于取得了一致的辦法。有的小組會一共開了九小時之久，務必使意見趨於一致才肯罷休，這樣經過大家反覆討論的結果，其周詳性較諸在大會上來討論來表決，自然要好得多了。這就是民主集中制。

四、代表會議

十一月三十日代表會議正式開幕。除全體代表之外，還特別邀請了青年團、馬列學院、北京大學等校的來賓。教育部錢副部長也於那天出席講話，他根據人民政府的文教政策結合着清華的具體實況而提出了「堅決改造，穩步前進」的口號，在長達三小時的報告裏，他規劃出了清華今後發展的方向。

大會開幕以後，主要的工作就集中在提案的表決上。經過了主席團縝密的討論之後，審查的結果，把所有的提案一共歸併成七類：有的是「請校委會辦理」，認爲校委會有此條件可以做而毋須經過向上級請示與開大會討論。有的則須「請大會討論」。有的則超過了學校的能力範圍，於是就轉呈「教育部辦理」。有的則是「請校委會斟酌辦理」。有的則是「俟研究後再作決定」。有的是直接交各單位如校醫室體育館辦理的。也有的因礙於條件而「暫緩辦理」的。

有些提案因在協商過程中與原意稍有出入，於是代表們又再回到群衆中去，有些團體召開了基層群衆會議來報告協商的經過，並進一步取得了「協商」。

大會開幕後的三天，經過了大大小小的協商，到十月四日便舉行了代表會議的閉幕會。閉幕會上校務委員會發表了「今後工作方針」的報告；這個報告主要的是在說明校委會對於代表會議的提案的態度，也可以看作是代表會議的重要收穫，表明了校委會對提案的接受。

五、「人民清華！」

這次代表會議使清華大學的發展更靠近了人民，使內部的團結，更爲提高。正如一位先生所說的一樣：「這次代表會議將是清華改造過程中一個重要界石。會議本身表明了校委會負責的態度。過去所做的一切均將公開的受全體群衆的檢查。同時，全體清華人員積極擁護和參加這次會議的事實也充分說明了我們大學群衆基礎的健全，也因之保證了今後工作的順利進行。」復次，這次會議是在政府已有了文教政策的原則、但還缺乏具體實施的辦法的情況下召開的。這個會議所累積的經驗，也將可能是其它大學的參考。是的，新中國爲清華帶來了新的任務，在未來的美麗的遠景裏，她將毫不猶豫地接受這個新時代的使命，肩負着人民的期望，在經濟建設同文化建設的高潮中，清華人將以堅強的信心來奔向她無限歡樂的前程！

十二月五日

更正

上期所刊千家駒先生「從共同綱領看私營企業政策」一文，第十一頁上欄第廿三行「商業比之手工業」係「商業比之手工業」之誤，茲承千先生來函指出，特此更正，並伸歉意。

冀西農村旅行所見

觀察特約記者

「紅日照遍了東方……我們在太行山上，」的歌聲，在抗日戰爭時期，響遍南北各地。我生長在太行山以東的平原上，却不曾登過太行山。在二十三歲以前，我一直沒有看到過山，初次出天津去北京時，半途中從車窗裏遠遠地看到北京的西山，當時還以爲那是老雲頭呢。二十五歲以後奔波南北各地，見識了不少山嶽，而近在家鄉咫尺的太行山一直沒有機會去接近它，可是我却沒有一個時候不心嚮往之，嚮往着我們的滹沱河的源頭。

京津解放以後，在華北的城鄉之間展開了一條壯闊的發展的道路。今年夏間我獲得了一個機會到太行山區的農村去學習，那次是跟隨華北人民政府民政部的幾位同志一同去的。他們是下鄉研究代耕問題，我則隨同他們旅行，注意一些關於農村增產和城鄉關係等問題，先後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訪問了我的西邊一些鄰居們。那裏是我家鄉的滹沱河的源頭，是我久已嚮往的太行山區。

六月下旬我們到達了石家莊，這是太行山東麓的一個有名的工商業城市，也是京津未解放前華北最大的人民城市，它早已具備了生產城市的風度與本質，走在那裏所習稱的朝陽大馬路上，覺得絕不同於新解放的城市，它的繁榮中有足夠的健康，而那種健康又勢必保證着它的繁榮和發展。

從石家莊到邢台的鐵路還沒有修復，和鐵路平行着的公路，在大軍南下時又經過一次整修，所以還相當的平坦。我們在石家莊汽車站上車前，每個人用汽車票換得了一隻有顏色的筷子拿在手裏，當時我很納悶，既然有了票，何必還要一隻筷子呢？當我走到汽車站的後院上車時才明白了他的作用。一個大院子裏停着六七部汽車，有燒汽油的，有燒木柴的，有的準備南開，有的準備北去，四五百乘客擁滿了院子，誰也不知道自己應上那一輛車，因此也用不到爭搶座位。過沒多久，一個檢票的人員來了，他站在車上招呼——拿紅筷子的上這個車，又過一會又來一個檢票員：拿綠筷子的上那個車……六七輛汽車的乘客很快的上完，秩序並沒有亂。那隻有顏色的筷子維持了上車的秩序，也解決了不認識字的農民們的困難，使他們不會上錯了車。這樣的一個搭車的方式，在接近農村的城市裏實在是有他的意義：他瞭解了農民的生活，又解決了農民的困難。

汽車公司的司機在途中對旅客是相當照顧的。在汽車停下來加水時，他會將開水和零食遞給車上的乘客，免得他們上下車不方便，態度很和氣。我過去對旅途中的汽車司機有成見，總覺他們是刁難旅客的，驕橫、油滑、生活腐化，是我在抗戰期間的後方對汽車司機的印象，而在這裏，他們完全不同了。他們是在認眞的爲乘客服務，謙和、規矩和一般的幹部一樣。無疑的，這是新社會使他們進步了。不，也許是他們早有了自覺，經過自己的一翻思想鬥爭，一腳踢開了過去的生活，走入新社會中來服務。不管是怎樣吧，總之，他們是和舊社會的司機完全不同了。

經過元氏、高邑到達邢台。邢台那個古老的城市，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農村城市，一切的商業都和農村有關，尤其是糧棧特別的多，說明了這裏是附近農村糧食的集散地。我們在邢台的專員公署住了三天。專署設在以前的一所教堂的大房子裏，有圍牆，種着蔬菜，有籃球場，年青的幹部傍晚多在球場打球。專署的幹部們大半已經下鄉去領導群衆進行剿蝗、抗旱等工作，留在署裏辦公的人又因爲有幾個病號，所以工作特別繁忙。

民政科吳科長是個農民出身的幹部，誠懇樸實，本鄉本土工作十幾年，所以一專區的情形特別清楚，在幾次的談話中，使我們對一專區各縣的情形增加了很多瞭解。他的文化水平雖不高，但對一切有關資料却掌握得非常有條理，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能夠例舉一系列的足以增加瞭解那個問題的數字，而且在數字之外均又能舉出一些典型而生動的事例，使人不得不折服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幹部是那樣的堅實有力。

「幹部決定一切」，太行區在華北說起來，是個有相當好的工作基礎的地區，在幹部儲備上，由於多年來與敵僞及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鬥爭的鍛鍊，培養出很多的堅強的幹部，但是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開展，北上和南調的幹部的數字相當的大，三年來華北全區調出五萬以上的幹部，單就每個地區的本位觀點上來看，不能說工作上不受一些影響。尤其是在縣與村之間的區級幹部，更顯得是量少質弱。區級幹部是脫離生產專搞工作的基層幹部，他是最直接聯繫群衆與村級幹部的，是基層中最重要的一環，可是他們被提升與調動的機會很多，他不像未脫離生產的村級幹部那樣比較有固定性，因此就形成了「量少質弱」的現象。在某縣有一個新的區級幹部到村裏去工作，竟因爲他對於政策的解釋不夠清楚，群衆反映不好，村級幹部不給他派飯吃，弄得他餓着肚子走回區裏哭着請求辭職。這雖然是非常個別的現象，也可能看到區級幹部的缺乏和需要大量的培養與加強。我們在邢台、內邱、臨城、贊皇等縣都聽到縣級的一些負責人說，應當加強區級幹部，我們同行的幾個人，在路上也常談到這個問題，回到石家莊正好讀到七月二日的北平人民日報，人民日報那天有一篇「紀念黨的二十八週年誕辰」的社論，題目是「爲進一步鞏固華北黨而奮鬥」。在社論中也談到了區級幹部的問題，並提出了七項華北黨的建設任務，我聯系着自己的這次旅行觀感，把那篇社論讀了好幾遍，一方面深深的感覺到中國共產黨在運用自我批評的武器上眞是做到了家，下級向上級反映的是那樣眞實迅速，而上級對下級情況的掌握又是這樣的正確與有力；另一方面感覺到自己對什麼問題所看到過於浮光掠影，不夠周詳與深入，因此想就地方幹部情形寫一篇報道的東西的念頭馬上打消了，黨不僅說出了黨需要說的話，而且說出了群衆要說的話。

縣、區、村各級幹部刻苦、樸實，謙虛的作風，早已蔚成風氣，看到一個幾乎是等於看到全體，他們絕大多數具有那種可敬的品質，這裏用不到詳細報導了。最使我感動的是有很多幹部忘記了自己的一切來爲人民服務。有些人按普通健康情形論，早該休養了，而他們還是力疾工作。這種情形在幹部大量調走後，更表現得相當的普遍（因爲南下幹部多是身體比較健壯的），一專區裏有三個縣長在患着慢性的病而堅持工作，專署裏有六七個幹部帶病工作，此外各縣縣府裏在六七月間都有患病的人，贊皇縣府的武秘書患着很重的失眠症，還是陪我們下鄉。

他們的疾病除了夏季的時疫外，最多的是肺病、腸胃病和神經系的病痛。這些疾病的來源當然是多年對敵殘酷鬥爭積累下來的，一方面是營養不夠，另一方面是工作過於繁重艱辛，再加上在鄉間醫藥條件不足，使得他們容易鬧病而不容易治病，病就積累下來，一時難以痊愈。同時他們在那種鬥爭環境中過慣了，對於一般的病痛也不大注意，他們一切是在爲了

工作。和我們同行的民政部的劉科長在千根村鬧起病來，是重感冒，發着高熱而且小便不通，他却不願放鬆自己的工作，後來不能支持了躺在床上，還不肯回城去醫治，經我們再三規勸，讓我們把他送到贊皇城裏去，兩三天後我們到贊皇時，他剛能吃些流質食品，但却又一開始同我們一起工作起來，連夜整理着調查千根村代耕工作的報告。

幹部的保健工作是今天應注意的問題，這些有功於人民的社會骨幹，我們需要好好關注他們的健康，爲了他們也是爲了整個國家社會的建設，需要將保障他們的健康的工作制度化起來，各級機關嚴格執行定期身體檢査，預防各種疾病，並普遍設立幹部療養院，發現了身體有問題的幹部，就得強迫他去療養，而糾正爲了一時的工作而不去治病的偏向，對於一些對疾病漠視，用拖來代醫的幹部要多灌輸衛生知識，使他們知道那些病可以拖，那些病絕不能拖。此外，對於機關團體的公共衛生，也需要在條件許可下更多做一些，使各級幹部的健康情形更好一些，工作效率也一定會更提高一步，而我們的國家建設也就會更加速的前進。太行區各縣大部分已有衛生機構，設備上則有待充實。

在農村中的工作幹部，因爲長期的住在農村，而且更多的就是農民出身，所以他們的生活與農民完全打成一片，從生活習慣到言談話語，幹部與群衆是看不出什麼分別來的。群衆在多年的正確領導下，政治覺悟已經大大的提高，這也是極少數的政治水平稍差的區級幹部到村工作上有時發生困難的原因，並不是群衆不服從領導，而是他們要求更堅強有力的領導。在農民中，政治覺悟最高的還是翻身的貧僱農，他們現在還是農民中的骨幹。他們一般的已經過着勤儉樸實的中農生活，可是他們與舊的中農在思想觀念上有些截然不同的地方。目前還需要對中農加強教育工作，我們在贊皇縣千根村住的時間較久，因此同老鄉混的也比較最熟，半數以上的人家我們都去搭過飯，烈、軍、工屬的家庭中，都多次訪問過，飯前飯後或晚上乘涼的時候，大家坐在一起無所不談，舊中農在思想上顯然不如新中農（翻身農民）積極堅定，有些地方，表現着思想模糊。

一個翻身農民曾經告訴我，他們的互助組裏的一個組員是舊中農，同旁人談起話來唯唯諾諾，甚麼事也不求甚解，總是自己打着自己的算盤，腦子裏殘存着很多的落後思想，傢具不願借給旁人用，共同作活時愛惜氣力，還要分個彼此遠近，不能夠把全組的人一樣看待。在抗旱工作中他不主持積極鑿井開渠，祇是迷信等老天爺幫忙。他硬說雨是老天爺下的，不然那裏會有那末多的水從天上掉下來呢。我們那位翻身的老鄉給他解釋下雨的道理——是地面上的水蒸汽升到天上，遇冷凝結而落下來，他却不求甚解，像是諷刺一般的說：「是啊，我看到每次下雨都是河裏的水，海裏的水，變成水汽飛上天去的，連水裏的魚也會跟着上去，去年夏天下雨，我還撿到一條二十斤重的大鯉魚呢，拿到市上賣了十多塊現洋。」他這種說法，使得給他解釋道理的人很難繼續說下去。那位翻身的老鄉，覺得對於這種人非常頭痛，却又不得不耐心的說服他、教育他。

我們從邢台經內邱、臨城向西北走到贊皇，從贊皇又到千根村，沿路都是走在太行山的東麓，望着我們河北的西邊的一個大屏障，覺得太行山是那樣的渾厚有力，與南方精巧玲瓏的崗巒完全不同。千根村算是剛進山區二三十里，我還沒有能登上太行山的最高峯。山區的老鄉們生活比平原裏更艱苦，他們平常收成時都有「糠菜半年糧」的說法，不過他們堅信苦難已經過去了，生活會一年年的好起來，他們都確信只要跟着共產黨走，一切是有辦法的，這不僅是擊潰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垮國內反動派給予了他們以血的經驗與教訓，使他們具備了勝利的信心，就是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爲抗旱、鑿井、渡荒）也啓發了他們的「人定勝天」的信念。

在抗日及解放戰爭中，在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鑿井抗旱、擴大生產中，農村裏先後湧現出了大批的積極份子，這些積極份子成了黨團員和村級幹部，是領導農村的有力的基層力量。貧僱農翻身打垮了消滅了封建勢力，自己成了土地的主人，使得農村面貌一新，在這個大的轉變中，農村的婦女隨着封建勢力的消滅，獲得了解放，婦女的社會地位比較以前大大的提高，每個村子裏的婦救會都是一個相當有力的群衆組織。她們參加了村中的各種活動，從政治到生產都有她們的份，她們的積極分子，同男子一樣的受着群衆的尊敬與愛戴。千根村的青年團支部書記杜金花就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婦女，她領導着全村的青年，她發動了烈、軍、工屬組織生產互助組，受着全村子裏群衆的讚揚。她們不僅有了新的社會政治地位，就是在文化生活上，也開展了一個新的境界，不少年青的婦女參加夜校，已經學會了寫普通的書信和簡單的工作報告。參加晚會時她們能夠大膽的唱歌、唱戲，這在舊時代的農村中是不可能有的事。在那死去了的舊時代，農村的婦女有的被禁錮在家庭裏守着針線渡過一輩子，也有的在育兒管家之外，被送到田間去做牛馬，家庭裏社會上都沒有發言權，過年過節也不能好好的玩耍兩天。現在她們是同男子的地位一樣了，成年女子有自己的婚姻自主權，不再受父母的包辦，多數參加勞動生產，參加勞動生產成爲了婦女的一種光榮。一些選擇婚姻對象的青年，時常把對方的勞動態度和勞動能力做爲重要的考慮的條件，相反的對一些以前嬌生慣養的地主家庭的女兒，成年男子們都有些戒心，他們說：「要她做啥用，什麼活也不會幹。」在新的農村中我們看到了勞動已經成爲一種光榮與義務，這其中是不分男女的，太行區的農村婦女已經有百分之八十參加了田間的生產勞動。

勞動就是光榮，勞動者受着尊敬，這並不僅限於體力勞動者，就是服務於人民的腦力勞動者在農村中也一樣的受着尊敬與優待。

鄉村的小學教師，再也不是地主們所僱的師爺和無所謂的「孩子王」了。他教育着大多數農民的子弟，並做農民補習學校和農民俱樂部的導師，黑板報與喊話廣播台也都由小學教師主持。就其工作性質與地位看，一個小學教師就是全村的文化衆政治教員，村級政權的一切活動都有小學教員在參加。他們不再是什麼清高超然的師爺，而是服務於農民，投身於農民翻身鬥爭的工作者，受着農民的親切的愛戴，在生活上也有相當的保障。每月一百三四十斤的新金米，在鄉下滿可以過着中農的生活，縣、區各級幹部都還是供給制時，而教員却早已經是新金制了。農村醫生不分中西醫，在農村也是受着尊敬與優待的。在農村成年男子勞力中，只有小學教員與醫生可以不負担戰時勤務與代耕。醫生是否免負戰勤與代耕，是要看他爲了給農民看病所耗費的時間多少爲定，如果一個醫生一月看不了一兩個病人，那就不能享受免負戰勤的優待；應免與不應免是由全村民主評議決定的。政府爲了照顧醫生的生活，勸告看病的農民要酌情形送診費或節禮，並且規定如果出村請醫生，儘可能的招待茶飯。總之，要使醫生在生活上能夠過得去，並且獎勵醫生收徒弟，以增加鄉村醫療工作的後備力量。在千根村，我看見一個醫道很平常的姓李的中醫，他們老夫婦和一個女兒生活過得很安適，他雖不是完全脫離生產的醫生，却仍然享受免負戰勤的優待。

新的農村，留給我們城市內過剩的知識分子一個非常寬闊的服務的道路；教育工作者、衛生工作者、農業技術工作者下鄉，服務農民，是會受到農民歡迎的。爲了發展農業生產，給工業化，奠定一個堅固的基礎，在城市內，我們還要發動大批的知識分子下鄉，來提高農村的生產與文化。另外，對於農村的幹部保健及教育中農的工作，也須要儘速進行與加強，這與提高農村的生產與文化，也是分不開的問題。

讀者觀察

關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吳方高　樊弘

一

編者先生並轉樊弘先生：

關於樊弘先生在「觀察」復刊號上的「共同綱領中的經濟政策」中說：沒有保證充分就業便是「承認馬爾薩斯的人口的公律」。我對這句話有一些意見。

首先，我認為馬爾薩斯人口問題的假說，是不能稱為「公律」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認為：「食物是成等差級數（一·二·三·四……）增加的，而人口則成等比級數（一·二·四·八·十六……）增加，食物趕不上人口需要。於是證明，失業與貧困乃是由於自然原因的必然現象」。他以此解釋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現象，把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失業與貧困，推到自然身上，說是一切社會固有的現象，這顯然是非科學的。

如果我們相信這樣非科學的學說，那只能得出反動的結論來。像艾奇遜之類就相信這樣的胡說亂道。說什麼「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中增加了一倍」，成了「不堪重負的壓力」，飯不夠吃，於是要革命（白皮書）。新華社的「六評白皮書」就曾提到，中國飯不夠吃只是別一些人吃太多而且亂打飯碗、壓搾、和對生產力的束縛，並不是因為什麼數學級數，追不上幾何級數的增加。「六評白皮書」說：在人民中國，只要生產恢復了，發展起來，人口再加幾倍也沒關係。我們的共同綱領沒有保證充分就業，也是由於在目前被反動派束縛與摧殘的生產力還沒有恢復與發展，而不是因為什麼農業生產「必然」趕不上人口增加，更沒有承認什麼馬爾薩斯人口「公律」。

因此，我覺得先生的說法很容易使人誤解。故特提請先生注意。此致

敬禮

吳方高敬上　十二月一日　北京

二

方高先生：

你的意見很好。使我得到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我在「觀察」上的原文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尚有其歷史的任務，因此，共產黨更進而爭取他們：（1）承認他們有開除工人的權利，（2）承認他們可以不負工人全部就業的責任。承認馬爾薩斯人口的公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尚要給予若干的積極的限制，儘管他們也要盡力去預防他。」我說承認馬爾薩斯人口的公律，我的意思是說：「現在工人的失業承認由工人自己負責，資產階級不負全責的意思」。這便是馬爾薩斯學說的本質。我的意思在此。至於人口之增加速於食物之增加一點當然是錯誤的。既然我這樣說，可以引起誤會，這當是我的錯誤。我看這「承認馬爾薩斯人口的公律：：」一句可以刪去。承你指出我的措詞失檢，我感謝你。

樊弘　十二月五日

我的認識過程

胡遇復

記得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反動政府在湘桂一帶可恥地大潰敗的時候，我正在湖南衡陽兒童教養院主持教導工作，當時經領了八百個難童，經過六個月的轉輾艱困，在一九四五年元月到達了重慶。到了重慶以後，我一方面回憶起我這一路的苦難，以及沿路所見到的混亂、欺詐一連串的事情，一方面看到重慶歌舞昇平的景象，以及當時國民黨官僚的貪污黑暗的情形，兩相對照，我就立刻產生了抗戰失敗的情緒。那時我雖然和新華日報也經常接觸，還曾經讀到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但是茫茫不能瞭解。我當時對于一般進步的民主刊物，比較愛好，就在那時，我和「觀察」的前身「客觀」結了緣。

抗戰終于勝利了，舊政協也召開了，我特別注意「第三方面」的努力。民主同盟主辦的「民主報」是我當時的主要讀物。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復員還鄉後，便有一段時間沒有和外面的書報接觸。後來在安徽績溪的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任教，那是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孔靈，「觀察」和文匯報就成為我主要的伴侶了。有一位同事黃克堅，也喜歡看這一類報刊，我倆平時在一起閑談談，因此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不過我們自己也仍然毫不介意地在研讀着。績溪城內有一位葛先生（名字已忘），他也是「觀察」的讀者，有一天他和我談起「觀察」上的軍事通信和政治評論時，他說：「如果照觀察上所說的那些話，國民政府真完蛋了。」三個年頭中，我始終是「觀察」的一個讀者，直至「觀察」被國民黨反動政府勒令停刊為止。我和一般讀者一樣，自從讀了「觀察」以後，對于反蔣的認識，的確是提高了一步，而且是越後越堅定不移了。所以在解放以後，我雖然是一個舊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但在精神上我始終是感覺愉快的。這是深深感謝「觀察」的一點。

可是在另一方面，「觀察」也模糊了我思想上的認識。一方面為了蔣記政府的腐敗，因之使我對于革命寄予很大的同情，但一方面又覺得革命畢竟是遙遠的事情，並幻想過所謂「自由主義」的出現。自從解放以後，經過幾個月的學習，瞭解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才知道自由主義是一個不合時代的空的東西。在三年人民解放戰爭中，我的認識過程，最先以為是黨爭，其後進一步認為是內戰，現在才完全正確認識到今天的世界上，不論是國內的鬥爭也好，國際的鬥爭也好，都祇是一個民主與反民主的問題。我過去思想上的模糊，也是受了「觀察」的影響，這是我今天要不客氣地提出批評的。

「觀察」復刊了！復刊後的第一期我沒有讀到，想必你們一定有一番自我檢討，當我購讀了復刊的第二期後，我情不自禁地高呼：「觀察」的確要戰鬥了！的確要進步了！第二期上費孝通先生的「知識份子與政治學習」一文是一篇坦白的供狀。我希望所有的「觀察」的作者和讀者，都能夠像費先生一樣，好好的自我檢討一下。今天的新社會已帶給知識份子一個有力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我們要決心扔掉舊的包袱，不要在狹隘的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裏打轉，正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掌握馬列主義的觀點，運用辯證的方法，走上毛澤東的道路！

「觀察」過去服務的精神很好，在一切為人民的今天，更需要好好的聯繫群眾。我完全同意「讀者觀察」一欄的設立。我希望「觀察」首先把過去的作者和讀者團結在一起，集體的學習，集體的改造，再影響到群眾中去，使「觀察」成為真正的人民的刊物。

最後，我對在蔣管區不畏艱險的「觀察」的全體工作者和被迫害的同人致深摯的敬意！

胡遇復　十一月二十三日

安徽蕪湖對江銅城閘

公營與私營

張敬亭

親愛的編輯先生：

你們專闢「讀者觀察」一欄，使讀者反映意見，這個意思很好，我現在反映一點意見如左：

一、有很多私營工商業者，對于政府

所公佈的政策，都很滿意，並願擁護。政府說要扶助私營工商業，鼓勵民族資本家，要他們積極投資，發展生產，這是很好的。但是在實際事業中，一般私營工商業者總感到有很多的困難。所以現在那些手裏握有資金的人，都不願積極投資。他們說：「拿出錢來開工廠，就拿不回去，連個利息也得不着，莫如放在自己兜裏化着方便」。這些人這種想法，當然是錯誤的、落後的。但是我覺得單單拿抽象的理論去改造他們的思想，還是不夠的，希望政府能更具體地，想出切實有效的辦法來鼓勵他們，把他們所掌握的資金，拿出來投資，以便增加生產。

二、我們未來的發展，是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向發展的，可是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希望政府依據政策，不左不右的進行一切，方不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共同綱領經濟政策第三十條，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但在哈爾濱市，存在着公企私企互爭市場的問題；私企做什麼，公企也跟着做什麼，連不足道的冰棍，公企也做，而且還用一千五百元的價格，和私企兩千元的做競爭。

三、關於經濟範圍，政府應劃分清楚，何者國營，何者私營，國家應該去發展私人無力經營的重工業，不要互爭利潤，互相擠兌，而遭受不應有的損失。國營與私營，應雙管齊下，努力生產，而使生產水準提高，早日走上社會主義的社會。

以上辭不達意，如果可能的話，請予删改發表。此致

敬禮

張敬亭　十二月、四日、
哈爾濱道外濱江街

編者按：張先生文內所述的三點，上期本刊所載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先生已有專文說明，可以參閱。第二點中所述的情形，據我們所知，哈爾濱是老解放區，情形和關內新解放的地區不完全相同。在哈爾濱，公營企業是領導着私營企業的，私營企業都圍繞着公營企業而從事生產，公營企業在基本上是照顧着私營企業的。

人民的火車　李梅

這次我從北京坐火車到南京，有些感想，現在敘述如下：

一、乘客在車上隨地吐痰，投擲菓皮廢紙，這是很不好的習慣。希望路局方面能設法幫助乘客，教育乘客，共同維持車上的清潔和衛生。

二、三等車也應當對號入座。我乘的那次列車從北京駛出時，車上的乘客並不多，但到了天津以後，乘客突然增加了。兩個人坐的位子，很多人就自動勻作三個人坐；還有很多人則在走道上站着，走道都給乘客和行李佔滿了。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短路程的客車上，還不成多大問題，因爲站一下也就到了，乘客自能體諒。但是在這長途旅程中，這種現象將給旅客以精神上和肉體上極大的痛苦；在我坐的一節車廂中，我聽到有好幾位乘客都在說着不滿的言語。每一輛客車本來都有規定的坐位數量，現在鐵路當局沒有遵守這一規定，售票沒有限制，因而造成了紊亂的狀態。

爲了替更多人服務，維護更多人的利益，在目前情況下，中國人民的鐵道在客運方面應該暫時加以變更：(一)暫時廢除各路長途直達車之頭等坐臥車，增加三等坐臥車。(二)暫時廢除各路短途頭二等車，增加三等車。(三)一律對號售票。

李梅　十二月二日
南京建鄴路華大南京分校

編者按：一、我們在原則上贊成頭二三等車一律對號售票。二、但是我們同時應當瞭解在目前這困難階段的實際情況，在這物資缺乏的過渡階段，普遍對號售票，條件恐怕尚未成熟。三、現階段並不實行普遍的平均主義，等級的存在還是被承認的。

自發的愛護　張文琦

執事先生：

上月二十八日寄上了人民幣四千八百元，定閱觀察半年十二期，因爲手頭一有現鈔，便隨手寄出，未曾考慮到當時的物價已比復刊號發行時上漲數倍。款子寄出後，才想到看一份報、寄一封信都要四百元了，四百元一份「觀察」是一定會不夠成本的。

果然，在第三期「觀察」寄來後，看到你們的報告，眞使我慚愧。如果你們多增加一個像我這樣的讀者，不但對你們沒有一些幫助，相反的，是在直接地剝削你們社裏的資金。回憶以前你們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艱苦地爲爭取眞理而受到種種壓迫，最後刊物被封，同人被捕，現在我還要以低於成本的款子來定閱，這太近於殘忍了！

最近物價的狂漲也眞使一般人又在爲生活問題而憂慮。雖然隨着革命軍事的將近勝利結束，經濟也會逐漸地穩定下來，然而總希望當局加以有效的壓制，尤其在物價波動得最劇烈的時候。

排印六號字是給讀者更多一點的有益知識，「觀察」封面也不一定要保持傳統的格式，如果像第五卷第九期起的那種只佔封面三份之一的格式，不是又可省出二三千字的一篇短文的地位來嗎？

這裏再寄上匯票七千二百元，補償上次寄上的四千八百元，而併滿一萬二仟元。這是我自覺而寄上的款子，不必有什麼收據寄來。請查收。順頌

撰安

張文琦　十二月二日

編者按：我們收到滬社轉來本刊定戶張文琦先生的這封信，現刊如上。

對于張先生這種愛護本刊的熱忱，我們是在心底裏深深感激的。他同情本刊，他愛護本刊，他願意幫助本刊。但是我們雖然感激張先生，在原則上，我們是不能收受張先生這七千二百元的。我們曾經規定：爲了紀念本刊的復刊，優待讀者，凡在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定閱本刊的，三個月六期祇收二千四百元，半年十二期祇收四千八百元。凡是我們所宣布的辦法，我們必須負責到底。物價的暴漲是事實，因爲物價暴漲而使本刊每一份的成本超過了當初規定的四百元一份的優待價也是事實。但物價的暴漲是一個意外，誰也沒有想到，我們不能因爲臨時發生的意外而破壞根本的原則——我們應對我們所宣布的辦法負責這一原則。所以儘管物價在十一月初就開始上升，但我們的優待價還是一直有效到原定的日期十一月底爲止。這是我們三年來的一貫精神，決不能因爲物價的變化而自己在中途不守信用。至于張文琦先生這種出于自發的愛護本刊的熱忱，本社同人是萬分感激的，我們相信我們其他的讀者對于張文琦先生這種行爲也是同樣景仰的。我們在這兒對張先生致崇高的敬意。張先生這七千二百元，我們在原則上是不能收受的。但是硬把這七千二百元退給張先生，這也不合人情。我們現在收下張先生這七千二百元，同時替張先生多定七期，即在張先生已定的半年之外，再向後多寄七期，這樣使人情與章程二者可以兼顧，這是一個公平的辦法。

順便我們在這兒向讀者報告，截至十二月六日止，本刊定戶已達二千零六十六名，其中滬社定戶計一千五百四十三名，京社定戶五百二十三名。我們在復刊號中報告希望經常有三千名定戶，現在已達到我們預期的數目的百分之七十。

上海社新裝電話

上海本社新裝電話，號碼爲（〇二）六二一六八，請各界利用。

每册售壹千元　（京）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報紙雜誌通訊社臨時登記證期字五六號
經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八一一號